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刊

二〇一〇年第二期
(总第四期)



目录

研究与探索

- 4 孙中山、宋庆龄与犹太人 郑培燕
15 中小纪念馆在城市发展中的困境和对策 王宁宁

馆建工作

- 19 《东方讲坛——
经典艺术系列讲座》观后感 俚青燕
20 博物馆纪念馆适应旅游市场
快速发展的研究与对策 夏义坤

宣教论坛

- 24 浅谈讲解员的素质 傅强
29 我馆志愿者工作中的多样化探索 许毅捷
32 宋庆龄与其“中国民权
保障同盟”战友——杨杏佛 丁灵敏

陈展天地

- 34 “邓广殷及其家人收藏的
宋庆龄书信展”筹办心得 宫洁菁

主 编 陆柳莺
副主编 董卫
策 划 俚青燕
执 行 麦灵芝
王宁宁

2010年7月

contents

馆藏研究

- 37 宋庆龄的诗 麦灵芝
41 从馆藏藏品解读宋庆龄与中巴关系 宫洁菁
45 关于李燕娥的几个问题 吴颖嫣

文博之道

- 50 博物馆藏品管理信息系统调研报告 王宁宁
54 一种文物保护、利用的新方法
——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 徐建华

藏书选译

- 56 《个人的历史》选译(连载四) 郑培燕

图版

- 宋庆龄的部分办公用品 徐建华

主办单位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1843号

邮编: 200030

电话: 021-64727982

传真: 021-54654810

网址

www.shsoong-chingling.com

投稿邮箱

wnn0828@163.com

孙中山、宋庆龄与犹太人

撰文/郑培燕

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是一个生命力强盛的民族。从古至今，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就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在古代，犹太民族通过经商等途径来到中国，带来了犹太民族的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同时也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因此，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中国对犹太民族是友好和宽容的，在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欧洲那种源于宗教民族偏见的反犹主义。在近代，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遭受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在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两个民族互相支持，互相同情。面对世界性的反犹大潮，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中国人民以宽阔的胸怀，强烈谴责纳粹反犹暴行，容纳犹太人，中国的有识之士尽全力援救犹太难民，并支持他们的事业。在华犹太人也积极支持并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很多犹太友人还积极投入了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中，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宋庆龄，都是中犹太友好交往史上的杰出代表。

孙中山、宋庆龄

同情犹太民族，支持犹太复国运动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国家、民族的复兴、贡献了毕生的力量，也为世界民族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孙中山对犹太人深切同情，

孙中山1924年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的时候，曾经两次提到犹太民族。他不仅同情犹太民族的悲惨遭遇，还对犹太人的素质、犹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伟大的犹太民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世界各国的犹太人进行复国主义运动，特别是在中国的犹太人进行复国主义运动的时候，孙中山给予了大力的鼓励和支持。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世界犹太人面临的问题。在犹太复国运动问题上，与孙中山的观点是一致的。宋庆龄认为犹太人民应该拥有自己的祖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应该能够工作和生活在一起。宋庆龄不仅对犹太人民抱以同情，还曾经公开谴责希特勒和他对德国犹太人的看法和待遇，甚至向德国领事馆抗议，表达对犹太民族的支持，以自身的行动，在中犹民族友好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出现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政治主张与运动。旧约《圣经》中有个一预言：号召犹太人回到锡安聚居。锡安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一座小山的名称，也是圣地耶路撒冷的别名，犹太人认为耶稣就诞生在这里。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这一预言，号召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返回锡安山，复兴犹太国，因此犹太复国运动又称“锡安运动”。

犹太复国运动是犹太人对民族悲惨经历的激烈抗争，也反映了对重建犹太民族

家园的一种强烈渴望。生活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犹太人都自始支持并进行着复国主义运动。而中国的上海，始终以包容的姿态，对犹太人敞开着大门。中国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就成立在上海，是1903年，由犹太商人埃利·嘉道理⁽¹⁾ (Elly Kadoorie) 资助，上海塞法迪犹太人成立的，称为上海锡安主义协会 (Shanghai Zionist Association, 简称S.Z.A)，由 E. I. 埃兹拉⁽²⁾ (Edward Isaac Ezra) 任主席，N. E. B. 埃兹拉 (Nissim Benjamin Ezra) 担任协会司库。1904年，协会司库 N. E. B. 埃兹拉创办英文犹太报纸《以色列信使报》⁽³⁾ (Israel's Messenger)，作为协会机关报，并担任主编。《以色列信使报》以宣传介绍传统犹太教和锡安主义运动，报道上海犹太社区的活动为主，作为上海第一种犹太报纸，备受上海犹太人重视。

1915年，上海锡安主义协会改组，由埃利·嘉道理担任主席，此后协会经历了短暂的沉寂。1917年，协会重新活跃起来。为了扩大锡安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争取中国政府对英国1917年11月2日支持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的《贝尔福宣言》⁽⁴⁾，《以色列信使报》加强对外宣传和联系，经常邀请上海的犹太名人和锡安主义者作演讲。埃兹拉还以《以色列信使报》主编的名义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谋求中国政



《以色列信使报》的创始人：N·E·B·埃兹拉、M·迈耶、I·A·列维斯(自左至右)。

府的支持，取得了很大成效。1918年12月4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陈篆表达了对犹太人民建立“民族家园”的渴望的同情，并致信上海锡安主义协会主席埃利·嘉道理，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尊重《贝尔福宣言》精神：

“I have the honor to inform you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adopted the same attitude toward the Zionist aspirations as the British Government.”⁽⁵⁾

埃兹拉也写信给了当时住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孙中山。孙中山先生一向深切同情犹太民族国家数度消亡、人民颠沛流离的苦难遭遇，因此，当世界各国的犹太人，特别是在中国的犹太人进行复国主义运动时，孙中山给予了极大的鼓励，积极支持他们为争取民族解放所进行的斗争。1920年4月24日，孙中山给埃兹拉回信，全文如下：

Dear Mr. Ezra:

I have read your letter and the copy of Israel's Messenger with much interest, and wish to assure you of my sympathy for this movement, which is one of the greatest movements of the present time. All lovers of Democracy cannot help but support wholeheartedly and welcome with enthusiasm the movement to restore your wonderful and historic nation, which has contributed so much to civilization of the world and which rightfully deserves an honorable place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I am

Yours very truly

SUN YAT-SEN “signed”⁽⁶⁾

此信中文翻译如下：

伊斯拉阁下，拜读阁下来信及《以色列通讯报》，非常欣慰。余愿就这项当代最伟大的行动之一，向阁下伸致同情之忱。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重建你们伟大而历史上著名的国家，必然会给予全心的支持与热烈的欢迎；这一国家，在世界文明方面具有重大的贡献，也应该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

孙逸仙

四月二十四日于上海”⁽⁷⁾

埃兹拉在《以色列信使》上刊登了这封信。作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公认的中国领导人，孙中山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无疑大大增强了犹太人在中国进行复国主义运动的信心与力量。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于犹太人，以及犹太复国运动的问题的观点，同孙中山是一致的。1920年，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住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宋庆龄一直承担着英文秘书的重任。孙中山给埃兹拉的这封回信，就是孙中山口述，宋庆龄代笔的。宋庆龄在1947年7月4日给立法院谢保樵的回信中对孙中山的这封信做了说明，她说：“这封信的内容是真实的，是总理口述给我的，最早发表在上海埃兹拉刊物《以色列信使》上。”⁽⁸⁾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秉承了这一观点，对犹太人报以深切同情。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很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而中国人民对犹太人一贯是宽容友好的，许多正义之士挺身而出救助犹太难民，当时的上海向世界上被迫害的犹太人敞开着大门，因而一度成为大屠杀受害者

的避难地。1933年，希特勒在柏林掌权，纳粹德国开始疯狂排犹，宋庆龄在上海积极营救被蒋介石政权关押的外国共产党人牛兰夫妇的同时，还积极投身到抗议德国法西斯恐怖的运动中。

1933年5月13日，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包括鲁迅、蔡元培、杨杏佛、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林语堂等前往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就德国法西斯对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迫害，向德国总领事提出了强烈抗议，发表声明《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声明说：“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动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个征象。”“最近这种野蛮行为是表现在焚毁进步作家、无产阶级和犹太作家的书籍上，这种事只有在人类历史上野蛮和无知的黑暗时代才发生过。”声明列举了许多详细的具体事实，“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的事实……”⁽⁹⁾该声明让德国法西斯知道他们的暴行已大白于天下，让中国公众了解了真相，在上海和各地特别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色列信使》1933年6月2日刊登了N. E. B. 埃兹拉关于此事的题为《文明世界反抗西特勒主义》的文章。

1947年7月，联合国大会就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表决前夕，为争取中国政府在联大上对犹太人的支持，上海锡安主义团体中国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领导人朱迪丝·本-埃利泽⁽¹⁰⁾给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写信，希望就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重建国家的

问题争取中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当时的立法院编译处处长谢保樵在为孙科起草回信之前，致信宋庆龄，征询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在回信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说：“众所周知，六百万犹太人在最近的战争中被杀害。很多幸存者无家可归，无所依靠。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回到巴勒斯坦。中国也是成员国之一的联合国组织，说他们尊重国家的选择、《贝尔福宣言》以及《巴勒斯坦托管》，为大规模移民做准备——最终建立民族家园，但在实际执行这一点的时候，却有很多困难甚至对抗。因此，结合孙中山博士的这封信，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郑重就这一问题重新确认在联合国组织中采取的立场。”⁽¹¹⁾宋庆龄在给友人哈里·希尔的信中也曾写道：“为什么犹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祖国；为什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不能工作和生活在一起，这是毫无道理的。”⁽¹²⁾这里不难看出，宋庆龄同情犹太人，也赞同孙中山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

孙中山、宋庆龄对犹太复国运动的观点，在中犹友好发展史上，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华民国政府1918年支持《贝尔福宣言》和1920年孙中山的信之后，上海锡安主义协会收到了很多中华民国领导人的支持和承认。1927年11月2日，《贝尔福宣言》十周年之际，中华民国海军上将、前外交总长蔡廷幹致信埃兹拉：“转眼之间宣言已颁布十周年。我希望你和你的同事继续为犹太民族独立而奋斗。你们有辉煌的历史，值得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府而存在。”⁽¹³⁾

1938年，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出兵侵吞奥地利后，悍然掀起新一轮的排犹浪潮，公然

对德奥两国的犹太族居民实行迫害。这时对被迫流亡海外的犹太人，中国方面欲施以援手。1939年2月17日，孙中山的长子，时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的孙科提出议案，建议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容纳穷无可归的欧洲犹太难民⁽¹⁴⁾。孙科的这一议案，一定程度上是受孙中山的影响。孙科认为，孙中山生前一再提倡实行人道主义，如果此项建议能够付诸实施的话，必然能得到美、英等国人民的好感，而且很可能会获得国际上拥有强大财力的犹太族商人、银行家、实业家对中国艰难的抗战事业的支持与帮助。而当时于右任、孔祥熙等国民党高层人士也对犹太难民问题的日益严重感到不安和忧虑，因此孙科的提议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但是蒋介石不置可否，后来由于海岸被封锁，抗战十分艰苦，政府无力顾及落实此事，最终该议案没有能够实施。

1947年，联合国大会即将就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进行表决，为了争取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对犹太人的支持，锡安主义团体做了很多努力。1947年6月14日，上海《大美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将孙中山支持锡安主义运动的信件内容登出来，并呼吁政府在犹太复国问题上以孙中山的政策为指导。当时朱迪丝·本-埃利泽也给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孙科写信，阐明锡安主义者的立场，并争取中国政府的支持。朱迪丝称“孙中山先生是真正的民主原则和理想的捍卫者，全心全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如果当前联合国组织的决定要建立在正义和人权基础之上，我们感到联合国组织不能不赞同其前身国际联盟在国际范围内制定的法令，从而悉心服务于盟国事业的犹

太民族，将在巴勒斯坦重建一个独立的国家。”“作为最伟大的领袖和政治家言论的代表，孙中山……支持锡安主义理想的声明在今天也是适时和恰当的，因为他们是对人类和政治问题深刻理解的产物。”⁽¹⁵⁾因此，如前文所述，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编译处处长谢保樵致信宋庆龄，确认孙中山这封信的真实性，并询问宋庆龄是否存有复本，除此信外，宋庆龄是否还有其他材料可以证明孙中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以及宋庆龄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称“宋庆龄对上述问题的看法举足轻重，并将极大尊重”。⁽¹⁶⁾1947年7月3日，宋庆龄给谢保樵写了回信，告知孙中山的这封信是真实的，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此后，1947年7月4日，孙科给朱迪丝的回信内容如下：

Dear Miss Hasser:

In reply to your letter, I wish to state that the Zionist movement is championing a worthy cause. I am glad that the late Dr. Sun Yat-sen's sympathy for, and support of, the movement have produced results. As a lover of democracy, I fully endorse my late father's views.

Assuring you of my wholehearted sympathy and wishing you success,

I am

Very truly yours,

Sun Fo⁽¹⁷⁾

这封信应该就是谢保樵在征询宋庆龄的意见之后帮孙科起草，孙科以南京政府立法院的名义回复朱迪丝的。这里孙科表示完全赞同其父孙中山先生对锡安主义的支持，给予锡安主义运动以同情和支持，并祝锡安主

义运动成功。中国政府在随后11月举行的联大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表决，也由原定计划投反对票，改投弃权票。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并使耶路撒冷国际化，之后，由犹太人组成的以色列国成立。

由此可见，孙中山、宋庆龄对于犹太人、犹太复国运动的观点，对中华民国政府在犹太问题上的立场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中犹友好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友好交往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孙中山、宋庆龄与犹太人的友谊

孙中山、宋庆龄不仅同情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还与众多犹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国际犹太友人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发展，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以及物质上的、思想上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孙中山事业乃至思想的发展。作为孙中山的革命伴侣和得力助手，宋庆龄见证了孙中山与许多犹太友人的友谊，亲身经历了很多历史时刻，也延续了与很多犹太友人的友情。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的革命生涯中，与多位国际犹太友人保持着亲密接触。这些犹太国际友人团结在宋庆龄周围，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伟大的贡献。而宋庆龄与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也得到了人民的广泛赞扬。

旧上海著名的伊拉克裔犹太冒险家，地产大王哈同，全名欧斯·艾·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是移居上海的中东塞法迪犹太移民的一员。他在上海乱世中发展，结交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同各界要人如章太炎、蔡元培、孙中山等革命党建立了联系，

并予以资助。哈同很早便与孙中山相识，并始终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曾多次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给以资助或协助筹款，帮孙中山渡过难关。早在1903年秋，哈同得知孙中山准备出游檀香山，但是旅费短缺，便通过友人出资相助。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于12月25日由欧洲回到上海，受到了哈同的热情接待，并入住哈同位于静安寺路的私邸爱丽园。次日，哈同又在爱丽园举行盛宴欢迎孙中山。1912年4月6日，哈同在爱丽园内宴请孙中山，女宾有孙中山的两位女儿和他的秘书宋霭龄，并合影留念。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形势的逐步恶化，孙中山先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曾有一度，孙中山先生深居在爱丽园。孙中山对于哈同也颇有好感，与哈同夫妇关系亲密，他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哈同夫妇曾接受孙中山的邀请去南京小住。回上海后，哈同写信给孙中山，表达感激之情。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曾住在哈同花园。哈同将孙中山居住过的“待雨楼”一带改名为“仙药窝”，其意为：这里曾是孙逸仙携救国救民之药的藏身窝。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时，需要费用，哈同得知后，在爱丽园宴请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表示愿意捐款。两日后托好友曹亚伯带去5麻袋现钞。⁽¹⁸⁾孙中山与哈同的友谊，体现了犹太人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支持。而哈同的这种支持，也是孙中山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种互动。

美籍波兰犹太记者索科斯基(George E. Sokolsky)，又名索克思，是1904年创刊的《远东时报》的主编之一。《远东时报》是外国在华发行的英文报刊中少数倾向同情孙中山的报刊之一，两位主编李亚

(George Bronson Rea)、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同孙中山关系密切。该报曾致力于宣传孙中山的学说，《实业计划》最早发表是在1919年3月的《远东时报》上。⁽¹⁹⁾索克思是在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孙中山的革命生涯陷入低谷的时候就认识孙中山的。他曾在彼得格勒的《俄国每日新闻》担任编辑，目睹了俄国十月革命，并结识了列宁、托洛茨基等人，为孙中山提供了大量十月革命的第一手消息。孙中山著书立说时常与他探讨一些哲学问题。他还通过在《华北明星报》等刊物当记者时的广泛联系，主动帮助孙中山进行对外联络。在他的帮助下，1922年8月至12月，孙中山与俄国犹太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取得了间接联系，并达成了合作的初步意向。索克思还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和十月革命时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友谊，在1923年1月帮助越飞与孙中山见了面。1月18日，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同下，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设宴招待越飞等人，后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会谈。孙中山和越飞的谈话以及在此之前五个月中他们之间的通信，都是用英文进行的，并且无疑都是由作为孙中山英文机要秘书的宋庆龄经办的。⁽²⁰⁾1月26日，双方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可以说越飞的到来，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特别是联俄政策的提出、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越飞的帮助下，孙中山成功实现了联俄，几个月之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也达成了国共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索克思的帮助。

索克思与孙中山的友情，在孙中山逝世以后得以长存，1926年4月，即孙中山去世一周年期间，索克思在《远东时报》上发表《孙逸仙主义》一文。⁽²¹⁾1929年6月，索克

思再度在《远东时报》发表《纪念孙逸仙》一文。文章中索克思回顾他同孙中山的交往，对孙中山作高度评价：“只有那些熟悉孙中山的人能够理解他人格中的巨大力量以及直到目前他的非凡名字仍在中国人民当中众口相传的魅力。在我从事于报道中国的人物与时事的十年中，我见过无数的中国领导人与官员，但甚至没有什么人能够接近达到那种使他高于其同伴之上的那种有磁性的吸引力、真挚的信念与个性的坚强不屈。但是孙博士是一部发动机，他发动起行动、威力、战斗。他将每一个朋友都变成信徒，即使某人怀疑他某些计划的现实性，但了解他的人没有谁会怀疑，唯有一种深厚的爱国主义的自觉意识激励着他的每一思索与动机。”⁽²²⁾。索克思的文章，不仅表达了他自己对孙中山的纪念，也表达了犹太人群体的感情。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得以贯彻执行，离不开另一位犹太人鲍罗廷的帮助和支持。1923年孙中山联俄政策确立后，鲍罗廷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俄派驻国民党代表，来华支援中国革命。同年10月到达广州。孙中山很欣赏鲍罗廷的组织才干和清醒的头脑，认为鲍罗廷之于自己就犹如美国总统华盛顿的杰出法国顾问拉斐德。⁽²³⁾鲍罗廷先后担任过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和革命委员会顾问等职，1924年参加国民党一大，协助起草大会宣言和会议的其他文件，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等。孙中山后期的诸多活动，都留下了鲍罗廷的影子，更离不开鲍罗廷的支持。无疑，这些活动也少不了宋庆龄的参与和大力协助。在革命事业中，孙中山、宋庆龄与鲍罗廷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宋庆龄常去鲍罗

廷家，他们都有在美国生活过的经历，可以用英语交流，在一起很愉快，鲍罗廷夫妇用宋庆龄能够理解的辞汇向她介绍俄国及国际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大大扩大了她的视野。鲍罗廷的妻子法尼娅在回忆录中曾说：

“孙中山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地同鲍罗廷谈话，详细询问俄国革命发展中某些阶段的情况、俄共（布）的历史、1905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凯歌高奏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的情况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和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政治工作。我们与她谈话也不用翻译，因她的英文极好。宋庆龄向我讲述了关于中国妇女的许多有趣的情况，介绍我认识了社会各阶层的一大批妇女代表”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与共同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者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宋庆龄和鲍罗廷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之旁，孙把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交给了鲍罗廷。”⁽²⁴⁾孙中山去世以后，宋庆龄继续孙中山的事业，她与鲍罗廷的友谊也得以延续。武汉政府1927年7月叛变革命之后，鲍罗廷受到国民党通缉，返回莫斯科。而宋庆龄经过同鲍罗廷、陈友仁和邓演达商量，远赴莫斯科，继续孙中山未尽的事业。

加拿大犹太人莫里斯·科亨（Morris Cohen），中文名字叫马坤，1911年与孙中山相识于加拿大，3月到5月间担任孙中山的临时护卫。1922-1925年间担任孙中山的侍卫副官。善用两支短枪，所以人们称他为“双枪科亨”。他对孙中山忠心耿耿，公众场合寸步不离孙中山左右。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与宋庆龄于广州蒙难一周年之际视察永丰舰，1924年6月，孙中山、宋庆龄出席



1938年,宋庆龄(右四)与随员伊迪丝(爱泼斯坦夫人,右五)、科亨(孙中山的副官,右三)等在广州伤兵医院慰问伤员。

黄埔军校开学典礼,1924年7月孙中山、宋庆龄、鲍罗廷等出席巴甫洛夫⁽²⁵⁾将军追悼会,这些活动中都留下了科亨的身影。在与孙中山的交往中,科亨深切感受到,中国是少有的能接纳犹太人,不曾对犹太人肆行迫害的国家。孙中山去世后,科亨继续尽忠于孙中山的事业以及家人。抗战爆发后,科亨在香港、重庆等地一度担任宋庆龄的便衣保镖。他非常尊重宋庆龄,像保护孙中山一样保护她,宋庆龄也很喜欢他。宋庆龄出外进行演讲或募捐活动时,科亨都威严地站在她的身后。宋庆龄也非常信任他,1938年,宋庆龄在广州期间的安全均由科亨负责。⁽²⁶⁾宋庆龄在广州伤兵医院慰问伤员的照片上,留下了科亨的身影。科亨还利用自己各方面的关系,给宋庆龄很大的帮助。爱泼斯坦在香港为保盟工作时,宋庆龄就曾经通过科亨,为他找了一份在新闻界的有报酬的工作,即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报纸《香港每日新闻报》编辑。⁽²⁷⁾1941年,宋庆龄在科亨陪同下,在寓所会见受美国犹太人联合疏散委员会派遣来香港调查和组织难民工作的劳拉·马格利斯。后来宋庆龄与马格利斯成为好朋友。⁽²⁸⁾6月底,劳拉·马格利斯奉命由上海撤往马尼拉,在船上致电宋庆龄,希望在香港转船时能拜访宋庆龄。船靠岸后,在

任何人都不许下船的情况下,是科亨将马格利斯接往宋庆龄住所。⁽²⁹⁾1941年7月,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一碗饭”运动,科亨也一直在她身边。香港沦陷前夕,科亨多次去见宋庆龄,请求她尽快离开香港。1941年底,科亨在香港被俘,被日军逮捕关入集中营,差点折磨致死。出狱后,他仍然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寻求国际支援。抗战期间,科亨还奔走于南京、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在国民党军队的对外联络和军备采购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48年,上海锡安主义修正派领导人朱迪丝·本-埃利泽试图通过在中国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的科亨的关系与中国军方合作,筹备物资和运送人员,支持巴勒斯坦地区的锡安主义运动。1949年后,科亨又成为新中国的好朋友,多次应宋庆龄之邀来中国访问,受到宋庆龄亲切接见。⁽³⁰⁾

芝加哥犹太人雷娜·普罗梅是宋庆龄在武汉时期认识的革命友人,是鲍罗廷、宋庆龄等多人的好友。雷娜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所办的惟一英文报纸《人民论坛报》的主编。而宋庆龄在武汉时期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为中国革命进行国内和国际宣传,因此同《人民论坛报》关系很密切。雷娜在武汉时期,对宋庆龄帮助很大。武汉政府1927年7月叛变革命之后,宋庆龄决定去莫斯科完成孙中山的遗愿,一切手续和安排都是雷娜·普罗梅去办的,并在她的陪伴下来到莫斯科的。1927年11月21日雷娜因脑膜炎死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宋庆龄非常悲痛,冒着严寒亲自徒步参加送葬。可见,宋庆龄与雷娜的友情是非常深厚的。

波兰犹太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中文名艾培,记者、作家,是为数不多的几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的外国人士之一，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被中国官方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爱泼斯坦是宋庆龄生前非常信任的同志、战友和得力的助手。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爱泼斯坦在中国的岁月，大部分是与宋庆龄及宋庆龄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1938年底爱泼斯坦应宋庆龄邀请参加她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在中央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编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援助。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到中国参与创办了英文对外刊物《中国建设》（1990年1月改名为《今日中国》）。宋庆龄逝世后，他始终弘扬宋庆龄的精神、继承宋庆龄的事业，一直担任中国福利会、《今日中国》杂志社和宋庆龄基金会的重要领导职务，通过这种方式直接参与、继承和发扬宋庆龄的事业。宋庆龄生前谢绝了许多人为她作传的请求，只信任爱泼斯坦。爱泼斯坦在70岁时开始为宋庆龄写传记，花了十年时间，写成了《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是解读和宣传宋庆龄的最好范本，对于弘扬宋庆龄的未竟事业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和意义。

美国犹太人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ld T. Isaacs)（伊罗生）30年代在上海时曾是宋庆龄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积极分子、《中国评论》的主编。1932年7月12日，宋庆龄组成“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中，伊罗生和另外一位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在委员会中同宋庆龄紧密合作的积极分子。⁽³¹⁾1933年曾随宋庆龄去德国领事

馆抗议德国法西斯对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迫害。1933年夏秋，宋庆龄准备和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伊罗生也作为外国代表与会。杨杏佛在上海被特务暗杀后，伊罗生随宋庆龄参加杨杏佛的入殓仪式。⁽³²⁾当时，史沫特莱和伊罗生夫妇，是最常去宋庆龄家的外国友人。多年后，伊罗生和妻子维奥拉·鲁宾逊来华时，依然受到宋庆龄的热情接待。

奥地利犹太人魏璐诗(Ruth F. Weiss)，1933年10月来到上海，是在中国的进步人士，特别是在宋庆龄的影响下，决定长期留在中国，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并亲身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魏璐诗曾为史沫特莱提供学生运动的报道，同马海德、路易·艾黎等进步人士定期学习研讨马列，与在北京的斯诺一起为国际联盟及《中国呼声》杂志转达革命动向并撰写文章。1943年她到重庆工作，其间协助宋庆龄重建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还配合宋庆龄、路易·艾黎为工合国际做各种对外宣传工作及其他组织工作，并多次到宋庆龄、史良、鲁迅家中探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为他们提供翻译、校对。抗战胜利后，魏璐诗回到上海，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工作。

德国犹太人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是犹太复国运动的积极支持者。1922年11月和1923年1月，爱因斯坦两次访问了上海，受到上海各界和上海犹太社团的热烈欢迎。在沪期间，爱因斯坦作了有关相对论和锡安主义运动的演讲。爱因斯坦的访沪影响很大，上海各大报刊纷纷作了报道和介绍，其中《东方杂志》还出了专号。爱因斯坦也是

宋庆龄的国际友人，宋庆龄从欧洲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多封电报，请她协助营救牛兰夫妇出狱，在电报上签署的约90位外国知名人士中就有著名的德国犹太科学家爱因斯坦。⁽³³⁾宋庆龄在营救救国会“七君子”的时候，也呼吁国际上的道义支援，并取得效果。1937年1月14日，国际知名人士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其他要人，对沈钧儒等被捕一事表示关切。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联署的知名人士之一。⁽³⁴⁾宋庆龄曾于1949年2月致信爱因斯坦，争取他对即将在美国建立的新的援华救济组织的支持。⁽³⁵⁾

俄国犹太人阿龙·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知名作曲家、剧作家，1932年到上海，曾创作了多部中国题材的歌剧。他创作的歌剧《孟姜女》是以中国古代传说中悲剧性人物为题材的音乐作品，鼓舞人民起来反抗专制压迫。《孟姜女》的演出是多文化的产物，还反映了当时二战时期的政治气候。1945年11月25日，《孟姜女》在兰心大戏院演出，在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等美军将领观看演出，并邀请剧团到美国演出。1946年3月，《孟姜女》再度上演，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义演两场，宋庆龄、宋美龄、孔祥熙和各国驻华使节、文化参赞、武官等出席观看，获得一致好评。宋庆龄到场主持，并为全体演出人员颁发纪念章。该剧义演收入达8000美元。⁽³⁶⁾阿甫夏洛穆夫是一位终生为中国民族音乐贡献力量的俄国犹太作曲家，与中国音乐、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孙中山、宋庆龄与国际犹太友人的友好相处，为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及精神支持。这些犹太国际友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身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反

法西斯斗争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都表明两个伟大的民族，是能够友好相处的，也激励着两者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前进！

注释：

(1) 埃利·嘉道理爵士(Sir Elly Kadoorie)(1867年-1944年)：犹太人，是上海塞法迪犹太社团有影响的领袖之一。

(2) 埃兹拉家族是上海塞法迪犹太社区中有影响的家族，早年积极进行贸易活动，后来大规模从事房地产经营。

(3) 《以色列信使》(1904-1936年)：也译作英文《犹太月报》或英文《犹太日报》，1904年4月22日创刊，由侨居上海塞法迪犹太人发起。该报是上海犹太复国会和犹太民族中国基金会的喉舌。

(4) 《贝尔福宣言》(或译《贝福尔宣言》)：英国的中东政策和以色列建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文件。支持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条件是不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权利。最初以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务大臣亚瑟·詹姆士·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致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沃尔特·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勋爵的一封信的形式出现，信中说：“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应明确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贝尔福宣言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和中东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Israel's Messenger (Shang-

- hai), November 24, 1927; Tcheng Log, Peking, To Elly S. Kadoorie (copy), December 14, 1918, CZA Z4/2039)
- (6) Sun Yat-sen to N. E. B. Ezra, April 24, 1920, Israel's Messenger, November 4, 1927
- (7) 国父全集编委会编: 致伊斯拉贺其为重建祖国而努力函(译文), 《国父全集》第五册, 第221页
- (8) (11) 宋庆龄致1947年7月3日致谢保樵信
- (9) 《申报》, 1933年5月14日, 宋庆龄选集上卷, 第120-123页; 《为新中国奋斗》, 第49-51页。
- (10) 朱迪丝·本-埃利泽: 父姓哈撒。父母系俄国犹太人, 生于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积极参加上海锡安主义青年组织的建立和活
动。日军占领上海后曾为抗日地下组织做工作。二战后, 积极投入创建以色列国的工作。
- (12) 宋庆龄1948年4月29日复哈里·希尔信,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 第687-689页
- (13) Israel's Messenger, November 4, 1927
- (14) 《重庆国民政府安置逃亡犹太人计划筹议始末》, 《民国档案》, 1993年第3期
- (15) 朱迪丝·哈撒1947年6月20日致孙科信
- (16) 谢保樵1947年6月27日致宋庆龄信
- (17) Sun Fo, Nanking, to Judith Hasser, Shanghai, 4 July 1947, CZA
- (18) 阿文: 《哈同全传》, 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版
- (19) 邓丽兰: 《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 (20)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119页
- (21) Sunyatsennism, The Far Eastern Review, April 1926
- (22) In Memory of Sun Yat-sen, The Far Eastern Review, June 1929
- (23) 拉斐德(1757-1834): 法国贵族出身的政治活动家, 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 功勋卓著, 被称为“两个世界的英雄”, 后又参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 (24)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第135-136页。
- (25) 又译高和罗夫、巴富罗夫等, 苏联来华工作的首任军事顾问, 1924年7月18日乘广九列车赴石龙河面勘察时失足落水溺死。
- (26) 盛永华主编: 《宋庆龄年谱》,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622页
- (27)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历史不应忘记》, 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 第83页
- (28) 《宋庆龄年谱》, 第704页
- (29) 《宋庆龄年谱》, 第706页
- (30) 《人民日报》1956年3月27日; 《双枪马坤——孙中山的外国保镖》, 第386页
- (31)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第293页
- (32) 《宋庆龄年谱》, 第510页
- (33)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第290页
- (34)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第346页
- (35) 《宋庆龄书信集》下册, 第40页
- (36)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第506页

中小纪念馆在城市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和对策

撰文/王宁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外来影响，中小纪念馆面临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挑战。如何突破现有的樊篱，更好地利用文物为大众服务，开拓更多的生存空间，成为中小纪念馆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本文将结合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近年来在实际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分析现阶段中小纪念馆在城市发展中可能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

困境

一、周边环境的不可控制

一个历史文化遗产是连同其环境一同存在的，保护不仅是保护遗存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的环境，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的风貌，这是多年来人们形成的共识。由于中小纪念馆占地面积较小，容易淹没在周边环境之中，他们最容易受到城市规划的冲击。在道路维修等市政设施的建设中，有许多中小纪念馆的建设控制地带甚至保护范围都遭受冲击。在去年迎世博淮海中路地段改造中，故居建设控制地带中的建筑物遇到了许多“改造”。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淮海中路上近代优秀历史建筑的遗存较多，在这次施工中，故居周围的一些建筑并没有遭受很大的改造，一些小修小补也并不影响整体环境的历史风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周边环境。但是我们仍应时刻警惕故居周围发生的变化，例如我馆在轨道交通10号线的建设

中，就碰到了隧道工程盾构将穿越故居保护范围的问题。如何在保证故居建筑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推进这一工程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二、馆内资源的受限

在外部环境如此紧逼，内部空间如此狭小的中小纪念馆，还面临哪些文物保护的窘境呢？由于可控用地的限制，中小纪念馆却依然要实现收藏、研究、教育三大功能，因而有些方面不得不陷入为难的境地。我馆占地4844平方米，大部分是参观区域。在向公众开放的过程中，由于庭院狭小，无法满足观众的停车需求，前来参观的旅行团只能将车暂时停靠在门口的淮海中路上，观众上下车很不安全，如此条件极大地制约了观众的参观。除了故居主楼的原状陈列外，为更好地帮助观众了解宋庆龄，我们在200平米的“微型”展馆内展示了宋庆龄的生平。我们希望带给观众一个完整的宋庆龄，但现有的展馆无法全部将宋庆龄的方方面面铺展开来，十分可惜。解放后，宋庆龄在上海居住了三十多年，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物，但文物保管库房只能依托于原有建筑，保存环境和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限于资金和场地，中小纪念馆无法为每一个需要的职责安排对应岗位，很多时候，一个人要负责多件事情，这对我们的知识结构提出了重大考验。尽管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已经尽可能地让员工做到一专多能，但总

会碰到员工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在藏品信息采集时，时常会碰到文物的内容是用俄语或其他小语种记录的，这一语言障碍使得我们无法深入了解藏品价值，但是若为这些藏品而专门请一位语言专家入职，这样的成本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三、规章制度的差异化

近30年来，文物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得到了很大发展。1982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成为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基本法律依据，并为以后文物保护领域法律法规的完善打下了基础。随后，国家又颁布了各种文物行政法规，如《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等，这些法规有些是对《文物保护法》的细化，有些是对文物保护的各个领域做的专题规定。随着形势变化，原有的《文物保护法》不能适应当下的实际需求，因此，2002年，国家颁布了新《文物保护法》，突显了文物保护的重要地位。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较大，因此文物工作在各地存在个性化的需求，依照《文物保护法》，各地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法规，如上海地区的《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上海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等。这些规章同样是我国文物保护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起到了完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具体操作的作用。目前，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了纵向层次，但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纪念馆时，仍会碰到一些个体差异的问题。因此对于每个不同的纪念馆来说，在横向层面上完善制度，使在《文物保护法》或各级行政法规中规定的较原则的东西，在最基层的纪念馆层面给予

细化，使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成为现阶段中小纪念馆棘手的问题。

四、藏品研究的瓶颈

对中小纪念馆来说，藏品研究不可谓不重要。它不仅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外宣传的深度与广度，也制约着馆内陈列水平的高低。同时，深厚的藏品研究功底在扩大纪念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人才是藏品研究开展的第一要素，但受限于纪念馆规模，中小纪念馆在吸引人才方面困难重重。加之纪念馆的社会功能运转需要大量行政人员，导致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非常有限，而这项工作又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当碰到一位员工因故离职时，他所积累的知识 and 经验便随之离去，这对提升纪念馆的“软实力”非常不利。

对策

一、面对现实、积极保护

尽管《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筑控制地带内，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但是市政建设的脚步不会停止，有时我们会碰到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的正面冲突。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考量，轨道交通10号线高安路站——华山路站区间隧道工程盾构穿越宋庆龄故居保护范围已成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在隧道施工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防止损害发生。我们就10号线盾构穿越宋庆龄故居保护范围时保护监测方案提请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审核，文管委于2008年10月组织了文物管理、隧道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领导出席的专题协调会。会上，我馆介绍了故居的实际情况，重申了故居的重要地位和文物保护的严肃性，

与会各方明确了施工和保护方案运作的程序和实施的必要条件。会后，我们对故居的现状拍摄了资料照片备案，配合监测单位布点并保存了基础数据，为下一步的观测提供了保证。11月，我馆应邀参加了建委科技委组织的专家论证会，我馆在会上再次强调了保护的范围和施工可能对故居带来的影响，要求施工方必须严格按专家提出的保护监测措施予以施工。2008年11月11日，施工盾构进入故居保护范围，我馆除配合监测单位的定时检测外，还指派专人每小时巡视故居受施工直接影响且基础最薄弱的围墙等周边情况，并将每天的检测数据汇总归档。11月15日，盾构顺利推离故居保护范围，到目前为止，未发现明显的异常情况。我们将继续密切观测，确保上海宋庆龄故居主体建筑及保护范围的安全。

二、合理规划、公众参与

中小纪念馆要想更好地发展，其必然趋势是扩大“领土”，通过征地、动迁等方式改善环境，但这并非是短期内可以达成的目标。此时我们更应该做的就是合理规划现有用地，使其最大限度地满足现有的功能需求。在前年配合宋庆龄文物馆重新布展的调整中，我们对办公区域重新做了划分，得以留出珍贵的48平方米用于临时展览，将宋庆龄鲜为人知的历史侧面展示给观众。去年我们在馆内举办了三次临时展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特别是《宋庆龄寓所国务活动文物展》，将宋庆龄在上海寓所进行的国务活动展示给世人，让观众对宋庆龄和寓所都有了深入的认识。在不同临时展览之间存在的时间间隙里，这一展厅还可用于举办讲座、研讨会、职工休闲等用途，以期最大化利用馆内场地。库房类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

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统一协调，择址另建。由于馆址所在地的土地紧张，现在许多纪念馆的库房与馆址并非都在一处，这虽然会给工作带来很大不便，但是也是目前尽快改善文物收藏环境的唯一办法了。

社会的长足进步使得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时机已经成熟，各种如火如荼的志愿者服务使得本作为外行的公众参与到纪念馆的工作中。漫步在纪念馆中，你可能遇到一位热情的讲解员为您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如果不是看到胸前的志愿者挂牌，也许您会认为他就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志愿者经过培训，已经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如今志愿者的服务空间完全可以扩大。因中小纪念馆的人才配备还不能完全覆盖整个文物保护的范围，如果我们通过志愿者服务将社会上的特殊人才吸引过来，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将在为我们节约大量资源的同时，大大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平和保护力度。

三、制度个性化——ISO9001质量体系标准

作为一个向公众开放的机构，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和规范文物保护，建立一个有章可循的制度是客观要求。现有的法律法规虽然给大部分的纪念馆运转和文物保护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但是在纪念馆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与现有的章程无法一一比对。因此，为了将这些矛盾的处理明确到规章制度中，让文物管理者在具体工作中找到明确的标准，避免管理活动中人治所引起的随意性，同时也方便文物保护工作者更好地依托本馆，保护文物，我们结合工作中的实际，配合贯彻ISO9001质量体系标准，制定了适合本馆的质量手册。这些规范是紧贴本馆实际制定的，以期解决现实工作中的问

题。

这里以文物管理的相关规定为例说明个性化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的益处。这些规范涉及文物藏品管理、不可移动文物管理、陈列文物管理等，为保证工作的有序进行，还编辑了详细的工作表单。如文物藏品管理规定中便涉及了藏品复制凭证、藏品借出凭证、出入库凭证等表单，在今年的几次文物巡展中，这些规范的表单不仅为馆藏文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日常工作留下了有据可查的档案。上述规章不是简单地套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而是根据我馆的实际情况作了调整。如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我们就较为侧重对孙中山、宋庆龄等近代文物的收藏和定级，对于那些虽有一定价值的，但与近代历史关系不大的就不再列为珍贵文物。2009年1月，我们正式通过了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的审核，获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这并不是我们文物保护工作的终点，各项规范还将随着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断完善。

四、馆藏文物信息的整合利用

学术研究并非无源之水，其基础工作是馆藏文物信息的深度挖掘。要更快地积累藏品信息，避免因人员流动造成的信息损耗，就必须加强对馆藏文物信息的整合利用。藏品信息的数字化，建立资源共享平台是实现信息整合与增值的有效途径。在馆藏信息的基础登录中，如有前人研究的相关论文或论著，需与藏品做好链接。平时工作中如有研究心得，应及时补充进藏品信息。利用现有的文本挖掘、概念关系词典等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专题分类、文物相似性分析等，打造文物信息的“知网节”。“知网节”是中文知识信息资源处理中的术语，是一篇文献与

其相关文献的链接点，将文献按内容相关性链接成知识网络型数据库。在纪念馆中，我们也可以借鉴于此，将散乱的藏品信息，借由“知网节”的链接，通过智能分析，找出藏品的关联，从而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线索。保证安全性是馆藏文物信息得以利用的大前提。管理海量的文物文本、图片、音视频等信息如果没有安全保障，一切利用都是镜中花。如今我们可以采用高强度加密等技术，严格分级权限控制，实现藏品信息与权限绑定，根据授权级别提供不同级别的内容等技术保证信息安全。另外在硬件方面，可通过藏品信息与计算机硬件绑定，藏品内容只能在授权用户的计算机上浏览，非授权用户无法打开资源，并对安装藏品管理信息系统的计算机数量进行限制等措施确保文物信息的绝对安全。

馆藏文物信息是文物研究的基石，但是宋庆龄研究的开展还有赖于对以往研究的把握和新材料的有效利用。在日常工作中，除了增强学术敏感度注意收集相关材料外，还应有效利用现有的数据库，如中国知网、万方资源、维普资讯等，事半功倍地建立宋庆龄研究的特色资源库。

宋庆龄一生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爱国情怀，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美德，是全社会共同的财富。故居所保存的文物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物质载体的同时，其背后蕴含的信息意义深远。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些文物担负着帮助世人恢复那份特殊的文化记忆，传递宋庆龄爱国精神的重任，我们精心保护下的故居也必然会以其个性和特色成为上海一道优雅的历史景观。

《东方讲坛——

经典艺术系列讲座》观后感

撰文/俛青燕

利用午休时间，断断续续地将《东方讲坛——经典艺术系列讲座》全部看了一遍，每看一集，都会有几分感动、些许感慨、一点收获。

有时候，不同的人，有相似的思想观念、人生经历，从而有相似的造诣，相似的成就；有时候，相同的人，却有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人生经历，从而具有不同的造诣，不同的成就。

综观经典艺术讲座的九位嘉宾，思想观念相似，人生经历不同，艺术造诣相似，个人成就不同，无论相似与不同，他们都跨越了自己人生的沟沟坎坎，攀上了艺术人生的巅峰。

梁波罗，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在演艺界，他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更让我钦佩的是，在他得了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经过医治后又重新站起来的那种意志、毅力、坚强、不屈！精神力量对战胜病魔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无怪乎现在有些手术需要精神微创化的介入，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陈薪伊，这位来自西部的著名导演，我曾经在上海图书馆聆听过她的演讲，她的演讲如同她排演的作品一样，充满张力，充满大气，《商鞅》、《贞观盛事》都是戏剧舞台上重量级的作品，竟由这位女性一手导演而成，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敬意油然而

生。

蔡正仁，一位将一生献给昆剧的老艺术家，对昆剧倾注了无限的热爱和情感，而陪伴一边的上海昆剧团副团长张军的衬托则恰到好处，他的对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更让人看到了昆剧艺术后继有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艺术需要传承、更需要发展的体现。

《世界娱乐秀与ERA——时空之旅》，主讲嘉宾周良铁既是著名的杂技魔术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以前总以为搞杂技魔术的人，手上有绝活，肚里缺才学，现在这样的认识已被颠覆。正是因为周良铁的生动介绍，激起了我要到马戏城一睹《ERA——时空之旅》的强烈愿望，终于有一天，约上家人、亲戚、同学，呼啦一帮人去现场享受了这时空交错、如梦如幻的精彩演出。

还有严顺开、金兆钧、王作欣、桂兴华等人的讲座，或富有哲理，或充满感悟，或高亢激昂、或流水潺潺，让人在视听感觉中享受着艺术的熏陶，在艺术熏陶中滋养心灵。缺少心境和灵魂的人，生命如同行尸走肉；拥有良好心境和高尚灵魂的人，即使生命短暂，但生命的过程肯定灿烂，让我们在艺术熏陶中提升生命的质量，活得更健康、更充实吧！

博物馆纪念馆适应旅游市场快速发展的研究与对策

撰文/夏义坤

博物馆纪念馆是普及教育、启迪民智的重要场所，也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他集中反映了一个地区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面貌，体现了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内涵。旅游者往往可以通过它看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了解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进入新世纪，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航空和高速铁路的发展的大背景下，旅游业作为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它带动了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其他旅游景点、宾馆饭店等各个行业的快速发展，对国家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2009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组织将这一天活动主题定名为“博物馆与旅游”，说明了博物馆纪念馆与旅游业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由于博物馆纪念馆与旅游业分属两个不同的行业，它们之间管理机制不同，组织目标有差异，二者之间存在诸多不相协调的现象，如：博物馆纪念馆需要文物得到有效保护，而旅游企业只注重自身的利益和旅游团队的要求，往往将旅游团队集中带往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使得博物馆纪念馆之间冷热不均，有的人满为患，有的门前冷落，加上博物馆纪念馆之间经营机制、管理理念的不同和受地理、地域条件的限制，相互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在旅游业持续发展、旅游景点呈出不穷、观众队伍不断壮大的背

景之下，却也让我们看到有些博物馆纪念馆被冷落，被边缘化的倾向。

如何改变行业之间不相协调的现象，提高博物馆纪念馆的知名度，保持博物馆纪念馆充足而稳定的客源，让博物馆纪念馆成为人们外出旅游的首选目的地，发挥博物馆纪念馆在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博物馆纪念馆工作者应该面对和考虑的重要课题。

一、探索沟通渠道，建立沟通机制，增进与旅游企业的了解和协调。

博物馆纪念馆与旅游行业都是旅游产业中两个不可分割的主体，在旅游产业之中，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其服务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为了解决因经营目标不同造成的文物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博物馆纪念馆除了按照开放的要求，加强文物保护的力度，采取必要的文物保护措施之外，加强与旅游企业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为双方的合作和利益的协调打好基础，应该成为博物馆纪念馆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沟通可以促进双方深入的相互了解，消除双方存在的隔阂和矛盾，寻找到双方利益的共同点。沟通既是两个行业之间的润滑剂，更是双方落实经营管理思想、实现经营管理目标的重要工具。博物馆纪念馆应该有负责与

旅游企业沟通的部门，可以设立专项经费、建立沟通制度、形成沟通机制；也可以主动上门拜访，采取召开联谊会、邀请参与活动等形式，建立联系渠道和桥梁，沟通互相感情，化解互相矛盾、增加互信了解；也可以定期召开博物馆纪念馆与旅游部门之间的协调会，交流工作思路，听取双方意见，了解市场动向，规范经营行为，提高服务创新，强化协调作用；条件允许，可以共同建立跨行业协会，确立长期合作关系，建立信息交流的平台，以期达到信息共享，动态协调之目的。

二、加强相互之间的联合，推进双方的联营，稳定观众的来源渠道

沟通、联系是基础，合作、发展是目的。博物馆纪念馆不仅在文物保护、研究宣传、环境建设等方面制定长远目标、科学规划和具体实施步骤，而且要站在观众的角度，开发完备配套的服务设施，提供经典丰富的文化旅游产品，提供优质周到的文化休闲服务。旅游企业是第一个与游客打交道的部门，观众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他们有最深感受，最知情。因此，博物馆纪念馆应邀请旅游企业提意见，献良策，或者邀请他们参与旅游项目的开发和策划，开展合作与联营，为观众提供价格公道、服务最优，收获最多的旅游项目和产品。也可以通过旅游企业将博物馆纪念馆标在旅游地图上，放进旅游路线里，排在旅行社计调系统中，让旅游企业为博物馆纪念馆做宣传和展销，扩大自身的影响，提高博物馆纪念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随着网络和信息化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许多行业都实现了网上联营，而博物馆纪念馆与旅游企业的纵向联合，通过计算机

和网络，动态了解旅游企业组团及行程信息，了解各个博物馆纪念馆观众预约情况，将给博物馆纪念馆经营管理工作带来质的飞跃。

三、给予旅游企业优惠，减少淡旺季落差，实现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博物馆纪念馆是国家永久的文物收藏地，也是文化旅游的主要场所，在整个旅游产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博物馆组织把博物馆定义为“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这个定义反映了博物馆纪念馆的公益性质。但是，博物馆纪念馆需要正确处理好“非营利”与“非盈利”之间的关系，灵活经营，争取盈余，促进事业发展，也是博物馆纪念馆提高社会和经济两个效益的目标所在。目前，国内所有博物馆纪念馆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行减免门票等优惠政策，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须常年向观众免费开放。在当前大部分中小博物馆纪念馆暂未向观众免费开放而面临游客分流、观众减少的情况下，那些仍未免费开放的中小博物馆纪念馆在经营管理中适当采取灵活应对措施，扩大营销，拓展市场，带动人气，特别是遇到旅游淡季，除了增加一些新的临时展览和提高服务质量，结合一些活动采取半价、折扣优惠等措施之外，采取与旅游企业签订优惠协议，降低旅游团体门票价格，直接让利给旅行社，或者与旅游企业与博物馆纪念馆签订长期让利互惠协议，在自身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吸引更多的旅游团体到博物馆纪念馆来，减少旅游淡、旺季观众人数落差，不失为一种迎合市场需要，

扩大与旅游企业合作，提高经营创收和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有效方法。近年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与多家旅行社签订了优惠合作协议，减低旅游团队门票价格，使旅游团观众保持了平稳增长，收到了很好效果。旅游市场竞争激烈，博物馆纪念馆需要宣传促销，旅游企业更需要宣传促销，他们设计好的线路、好的景点等旅游产品和以较低价格来吸引游客，博物馆纪念馆何不将宣传促销资金用于对旅游团队的让利上，让旅游企业为博物馆纪念馆做宣传、做营销，这也许是解决当前博物馆纪念馆营销人才匮乏，走出经营困境，集中力量抓好自身建设，提升品牌，提高服务的一项有效举措。

四、打造优秀展览，形成品牌优势，营造旅游热点。

博物馆纪念馆门庭冷落，游人稀少，除了营销、宣传之外，不断推出思想鲜明、内容丰富、形式精美、具有时代特色的陈列展览也是吸引观众，赢得观众重要方法。要深入挖掘博物馆纪念馆藏品内涵以及展览、展品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设计制作丰富多彩的博物馆纪念馆文化产品，拓展和延伸博物馆的教育、传播和服务功能，使博物馆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观众。

1. 展览主题要鲜明。观众的来源不同，思想观念、审美标准、看问题的角度会有差异，因此，展览主题的把握会有一定难度。要结合展馆的特点，针对当代人的心理需求，根据陈列展品和已选的素材确定展览主题，做到观点明确，科学合理，寓意深刻，既可发挥博物馆纪念馆的宣教功能，又可提高观众兴趣。

2. 展览的内容要生动。要深入挖掘展品的信息、历史的知识和人物的事迹，认真地考察历史，细心地观察生活，注意积累和吸取生活养料，多思考、重提炼，制定好陈列大纲，设计好陈列表现方法；也可以组织专题研讨会，发挥专家学者的特长和聪明才智，着力做到准备充分，细节完美，努力向观众呈现一个脉络清晰、观点鲜明、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的优秀展览。

3. 展览的形式要新颖。要精心设计展览方案，从总体布局到展品组合，从立体空间到平面设计，从灯光照明到背景色彩，从单品展现到多媒体运用等，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不断完善，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历史与艺术的结合，给观众以震撼，给观众以启迪，给观众以美的享受。

4. 展览手段要先进。实物展品是任何图像、声音等高科技展示手段所无法替代的，但适当利用声、光、电的最新科技和综合效果，结合视频图像处理技术，场景合成技术，网络、数据库和触摸屏互动技术等巧妙组合运用，可以更加完善体现展览的主题思想，深度地解剖、扩展和演绎展品，挖掘展品所蕴含的背景、意义，调动观众的视觉、听觉、思维以及其他感官系统的互动体验，提高观众的观赏兴趣。多媒体是一个新兴领域，更新换代快，发展方向难以确定，因此，在运用上力求技术成熟、形式设计上有新颖创意，做到技术与内容无缝融合，以强化展览信息的传播，增强展览的表现力度。

好的展览是赢得观众，促进旅游发展的关键。因此，要注重提升展览品位，在展览选题创意、内容形式、展品挑选、展出手段等方面下功夫，通过精心设计、精心制作，使展览形成本馆特色，让展览融思想性、科

学性、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为一体，把观众吸引到博物馆纪念馆里来。

五、抓好队伍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形成良好口碑。

树立“以人为本，观众至上”的服务理念，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是服务行业的基本要求，随着旅游服务业的兴起和观众受教育程序的提高，建设一支训练有素、构成合理、组织科学、人员稳定的高素质的接待讲解员队伍，已成为博物馆纪念馆窗口形象建设的当务之急。讲解员是沟通博物馆、纪念馆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是博物馆纪念馆的名片，是博物馆纪念馆联系公众、吸引公众，提高知名度，发挥博物馆纪念馆功能作用的关键所在。只有讲解员才能把展览所蕴含的信息传达给观众，使静止的文物“活”起来，沉睡的历史“唤醒”来，让惊心动魄的故事打开人们的记忆，激起观众的共鸣；只有讲解员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才能让参观者感受到语言之美、历史之美和文化之美，才能发挥陈列展览的感染力、震撼力，引起观众的兴趣，引发观众对博物馆纪念馆的重视和关注。讲解是知识和语言的高度的综合艺术，是专业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结合。一个优秀的讲解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特征和综合素质，能够精通语言表达艺术的基本技巧，善于沟通观众心理，善于把握讲解节奏，善于引导观众参与，善于调动观众情绪，并具备高雅的气质，整洁的仪表，熟悉讲解内容而又对讲解内容具有强烈、深厚的感情，以及知多识广，良好的文明形象和职业道德品质。讲解员队伍建设，重点是抓好讲解员的选拔、培训和服务三个环节。选拔就是把思想好、品德优，文化素养高，

专业相对应，具备良好公众形象、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毕业生、优秀青年选拔到讲解岗位上。培训就是通过一段时间有计划和有组织的培养训练，把讲解员培养成为思想品德好，专业和理论知识强，文明素养高，讲解娴熟有技巧的优秀讲解员。服务就是针对每一个接待服务岗位，每一个接待服务环节，直至讲解员的每一个遣词用语、声腔语调，以及手势动作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形成体系、形成规范，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让观众高兴、游客满意。有一个甚至一批这样优秀的讲解员，就能够使每一位观众在讲解人员服务中享受到获得知识的快乐和心情愉悦的感受，就能够树立博物馆纪念馆在公众中的形象，形成良好的口碑。加强讲解员队伍建设是增强博物馆纪念馆旅游发展的“软实力”，增强博物馆纪念馆在旅游市场中的竞争力的一项有效手段。

六、完善服务设施，开发特色纪念品，给观众留下美好回忆

博物馆纪念馆是否处处为观众作想，设有舒适的参观环境，合理的参观路线，人性化的服务设施，为观众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和休闲场所，是博物馆纪念馆争取观众的有效方法。服务设施主要是停车场、纪念馆服务部、物品存放处、咨询处、语音导览器租借处、饮水处、休息室、盥洗室、医药箱等，以及醒目的参观路线标识，完善的老年人、残疾人通道，有条件的可以建立演讲厅、影视厅、文物鉴赏厅等，让游客听、玩、看、购和互动体验全方面地感受文化旅游和休闲的魅力，使观众走进博物馆纪念馆就有高尚文化的享受和宾至如归的感觉。

对于旅游者来说，一件精美而富有寓意

浅谈讲解员的素质

撰文/傅强

群众教育和服务是博物馆的主要社会职能之一⁽¹⁾，而在博物馆开展社会教育和向观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讲解工作又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讲解是以陈列为基础，运用科学的语言和其它辅助表达方式，将知识传递给观众的一种社会活动⁽²⁾，它既是博物馆展示自身形象和水平的窗口，也是联系起观众和博物馆之间的桥梁，更是代表博物馆为观众提供服务、传播知识的大使。不仅展品的意义和价值需要通过讲解而为人认知，在很多时候，一座博物馆的特色和气质往往也正是通过讲解员而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对许多

普通观众来说，讲解的好坏、讲解员的素质甚至成为评价一座博物馆最重要的标准。讲解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不仅直接影响着观众的满意度和社会宣传、教育的效果，还会影响到博物馆的自身形象甚至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形象。因此，讲解员的综合素质和讲解员队伍的建设就显得尤其重要，然而目前国内却没有专门针对讲解员的“统一标准”的考核或是认证，讲解员的水平究竟如何、他的综合素质是否达到了博物馆的要求，往往只能通过一些主观的标准来评判，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讲解员应该具有怎样的综合素

的旅游纪念品，不仅会为旅途增添乐趣，而且也会使旅游者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长时间保留参观博物馆纪念馆最深刻的印象，即使在旅游结束后，触物生情，仍能唤起人们的记忆，激发人们的感情。开发旅游纪念品，不仅是博物馆纪念馆宣传工作的需要，也是满足旅游者了解当地文化风情，增进历史文化知识，感受旅游购物情趣和美好购物体验的一种心理需求。因此，博物馆纪念馆应根据旅游者的不同需要，加大纪念品的研发，注重纪念品采用的新科技、新原理、新材料、新结构、新造型、新方式，做到品种多样，经济实用，价格合理，包装精美、便于携带，有本馆特色。

特别是那些博物馆纪念馆的珍贵历史藏品的复制品、仿制品和衍生品，往往凝聚了

源远流长的文化和工艺美术学的精华，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文意蕴和艺术精华而最受观众喜爱，当然，也可以此基础上的创新等。例如，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最近开发的樟树叶书签、吉姆轿车车模、孙宋大铜章等，都曾获得上海市旅游纪念品一、二、三等奖，观众喜爱，销量上升，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给故居也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总之，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交通运输行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旅游服务业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博物馆纪念馆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确立以旅游促发展的思路，加强自身建设，打造行业品牌，奠定在旅游产业中的地位，为迎来博物馆纪念馆与旅游产业的新的更大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质”这一问题来展开讨论和研究。

在笔者看来，一位合格的讲解员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

一、基本素质

所谓基本素质是指对一位讲解员的基本职业要求，包括：仪容仪表、衣着打扮、言谈举止、礼仪规范以及讲解时的语音语调、表情动作、眼神手势、精神面貌等等，还包括标准的普通话和必要的外语水平，当然作为宣传和教育的主体，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素养更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都是对讲解员最基本的要求，在笔者看来，这也是一位讲解员的立身之本。在工作中我们会发现，一位刚刚上岗的志愿者讲解员往往“带不住”游客，在展厅讲解时，跟随他的游客往往会越来越少，有些游客跟着听了一会就会选择自己观看，有些游客甚至会直接越过讲解员去参观，忽视他的存在，讲解员最后成了“孤家寡人”。而那些较专业的讲解员，在展厅里一站，就给人一种讲解员应有的感觉，或者说一种“气势”，这位讲解员不用去招呼，游客都会主动聚拢上来，渐渐形成“众星捧月”之态。其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讲解员的基本素质。对讲解员来说，博物馆的展厅就像是演员的舞台，讲解员本来就应该成为焦点所在。得体的穿着、良好的站姿、中气十足的声音，声情并茂的讲解自然就会吸引到游客的关注。而那些“带不住”游客的讲解员，恰恰是因为行为举止不符合规范、不像个讲解员，不被游客所认可，因而被忽视了。

这里笔者还想强调的一点是：作为一位博物馆、纪念馆的讲解员，应该注意自己与旅行社导游的不同。虽然讲解员和导游的工

作都是以服务游客为目的，但是讲解员作为博物馆、纪念馆宣教工作的主体，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使命，而导游受雇于公司或个人，商业利益在很多时候成为他们的首要目的。且不说敷衍游客、强制购物这些屡禁不止的现象，在景点讲解中，旅行团队的导游为了娱乐游客，往往口不择言、哗众取宠，导游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那些市井传言、道听途说的内容，这些信息没有经过认真的考证，很多时候甚至是子虚乌有、歪曲事实，虽然能暂时博得游客一笑，事实上却是些毫无营养的“垃圾信息”。而对讲解员来说，讲解内容的准确和严谨则是一项基本要求。作为一位博物馆、纪念馆的讲解员，对历史问题和社会现象必须实事求是，评论有据，以理服人，切忌在讲解中掺杂封建迷信、低级庸俗的内容，切忌愚弄观众、胡编乱造、不懂装懂。对那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更应该谦虚谨慎，采取与观众探讨，向专家求教的方法，如遇不同观点，应当大量引证最新科研成果进行论证说服，切不可武断专横和妄加评论。

二、专业知识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作为中国博物馆的从业人员，尤其是作为一位讲解员，如果不了解精深广博的历史文化，不懂得各地的民风民情，在讲解文物陈列和渲染历史气氛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受知识面的局限，使讲解内容变得枯燥乏味，而且遇到观众提问也难以敏锐回答，更不可能得心应手。由于事物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有些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是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在进行文物陈列的讲解演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联系类比，所以知识面越广，观众的提问就越容易解答，讲解时的内容就越丰

满，博物馆讲解员的职业素养越高，失误和失态的出现也会越少。这就要求讲解员平时要多读多看，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文化活动，不断进行知识的积累。

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讲解为例，整座故居占地四千八百多平方米，有故居主楼和宋庆龄文物馆两个主要场馆，全程讲解词只有不到一万字。可是要成为故居的合格讲解员，仅仅掌握这不到一万字的讲解词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位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一生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要向观众介绍这位伟人，就必须要对她所身处的历史环境有深刻的理解，要对她身历的历史事件有深刻的认识；宋庆龄又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活动家，一生交友甚广，而且与许多中外名人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提到宋庆龄，就不得不提到那些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宋庆龄一生笔耕不辍，留下无数文稿、书信和相关资料，要深刻理解宋庆龄的思想和革命活动，这些资料更不该忽视；故居保存着宋庆龄留下的珍贵文物数万件，包括许多重要的国务礼品和宋庆龄的个人收藏，这些物件的来龙去脉、艺术价值、背后故事讲解员也应了然于心；宋氏家族在民国时期举足轻重，家族成员个个声名显赫，更与孙中山家族、蒋氏家族、孔氏家族有着复杂密切的联系，海内外游客对其间的重重关系极有兴趣，讲解员也要有所了解。

上面所列，只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在讲解中时常要用到的知识，事实上，到故居参观的游客来自天南海北，提出的疑问更是五花八门，主楼的建筑历史、家具风格、树木花草、环境风貌、历史沿革……都会涉及到。当然要全面掌握这些知识并非易事，但是作为故居的讲解员，至少应该都有所涉

猎，这样一旦游客问到，不至于脑中一片空白，无法应对。

也许有人会问，要求一位讲解员又“专”又“博”，这现实吗？其实博物馆界关于讲解员应该“专家”化还是“杂家”化一直有所争论，但是近年也渐渐形成共识，那就是：应该两者兼而有之。⁽³⁾⁽⁴⁾

讲解员的“专家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群众文化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了参观群体中的高端层面，他们不满足于科普型的简单介绍，趋向于获得更加专业、更加翔实的讲解，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端知识群体更倾向于通过互动的交流满足知识的渴求，而这种需求是普通的讲解人员所无法满足的。因此，讲解员学识专家化、讲解员自身学者化是知识社会、信息时代对讲解员提出的要求。

而除了专业知识之外，讲解员在各知识领域的“杂家”化也是这一职业的需要。一位合格的讲解员不仅应具备必要的博物馆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掌握与本学科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知识，包括基础文化知识、博物馆学、社会教育学、心理学等等。例如，为了对不同参观群体的心理状态做到拿捏到位，便于讲解过程中因人施教，讲解员应该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而为了研究观众的参观路线习惯、运动习惯、变化的规律等等，使讲解过程的安排更加具有针对性，讲解员也应具备一定的行为学素养；此外，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知识的广泛涉猎，对做好讲解工作也十分重要。

三、服务意识

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本身就是向社会提供服务，而讲解员则是博物馆为社会提

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力量。但是有些讲解员却抱着不应有的“高人一等”的想法，认为自己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是“老师”，不是“服务员”，往往在讲解服务中敷衍了事，甚至态度蛮横。其实作为博物馆从业人员，尤其是作为一位讲解员必须要具有为游客提供服务的意识，笔者认为，那些适用于大多数服务行业的行为规范一样适用博物馆的讲解员，“微笑服务”、“游客至上”这些同样也应是我们的理念。当然，博物馆也与普通服务行业有所区别，作为讲解员更关注的是游客精神层面需求，通过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回答游客的疑问，通过自己的优质讲解让游客对一段历史、一位伟人、一件器物有了全新的认识或更深的理解，从而增长见识、愉悦精神，这就是讲解员所能提供的优质服务。

同时在笔者看来，除了服务意识，服务的方法和技巧也是讲解员应具备的素质，讲解员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应多动脑、多思考，做好与游客的沟通，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游客反应进行一些调整和变通，既防止好心做坏事、更防止与游客发生矛盾。

还是以笔者工作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为例，由于故居的主楼内陈列了珍贵的羊毛地毯，所以游客进入主楼时参观需要穿上一次性鞋套。大多数时候，讲解员会善意提醒游客穿上鞋套，游客也会理解合作，可是也有些游客并不习惯这样的方式，认为多此一举，或是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此时讲解员按照工作的规范是必须要求游客穿上鞋套的，但是如果游客坚持自己的观点，就很容易发生矛盾。后来有些讲解员就采取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把穿鞋套这个行为和主楼的讲解结合了起来，他不是生硬的告

诉游客：“进入主楼参观，请穿上鞋套。”而是把穿鞋套这个行为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噱头”，他会告诉游客：“进入鞋套间，我们要穿上特制的鞋套，至于为什么要穿上鞋套，我会在后面的讲解中告诉大家。”把“祈使句”变成“疑问句”，把游客穿鞋套的过程变成之后讲解地毯的一个“伏笔”，这就无形中转了游客的注意力，让他们更关注于讲解，而不再去过多的考虑穿鞋套这一行为，这就在无形中化解了矛盾，这样的服务就能博得游客的满意。

四、心理素质

长期以来，讲解员的外在素质，比如形象、声音、语言表达能力一直被人们所看重，但讲解员的心理素质却为我们所忽视。事实上，对一位讲解员来说，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一些老讲解员所提出的：一名称职的讲解员，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对讲解工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⁵⁾。而心理素质中情绪的稳定性是首要因素。“情绪的稳定是语言与动作稳定的前提和基础。一场讲解效果的优劣，往往受到情绪条件稳定的制约与影响。”⁽⁶⁾一场准备充分的讲解，如若失去了情绪稳定这个保证，那么讲解员的一切“辛苦”则都会事倍功半。

其实在讲解工作中，突发情况其实并不少见，这些情况可能来自游客，可能来自讲解员自身，也可能来自外部环境，而这些突发情况不可避免的会引起讲解员心理的紧张的情绪的变化。生理学告诉我们，情绪和人的机体活动是紧密相连的。情绪的波动会引起人的机体呼吸、循环、内分泌等一系列的变化，导致语言与动作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下降，甚至失去自控能力。讲解过程中，讲解员因情绪紧张带来的心理、生理变化，会对

讲解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出现错说、漏说、忘词、结巴等现象，使讲解员在临场讲解中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这时候就需要运用呼吸调节（全身放松、做腹式呼吸）、语言暗示（对自己说“这次讲解我准备充分、我很有信心”）、回避目光（有意识的使用流动式的虚视方法，暂时回避与观众的目光对视）等方法进行自我调节，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情绪、稳定心境，从而继续完成讲解。

讲解员心理素质的另一个要素是应变能力。讲解的准备再充分，也难免会遇到一些自己一时不能回答的问题，此时就需要讲解员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和讲解对象临时调整讲解内容，或是跟据自己平时积累的知识现场组织语言，进行解答。例如笔者就曾遇到过一个“棘手”的问题，2009年2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来到我馆参观，在文物馆介绍宋庆龄从事外交活动的板块时，我向福田康夫先生介绍了宋庆龄珍藏的各国国务礼品，既有来自亚洲各国的，也有非洲和美洲国家的。这时，福田康夫先生突然发问：“为什么这里没有日本的礼品呢？”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一瞬间有些愣住了，此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在布置文物馆陈列时，由于展厅面积有限，所以选取文物时有所取舍，但这样的回答恐怕并不能让客人满意，很快我又想到主楼的客厅里摆放了一个来自日本友人的灵芝图案脱胎漆盘，于是我回答说：“宋庆龄特别喜欢日本友人赠送的礼品，摆放在了客厅里，所以没有出现在这个文物馆。”福田康夫先生微微一笑，看得出，我的这个回答让他很满意。同样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但是作为一位合格的讲解员就应该充分

考虑客人的感情，尽量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做出更好的回答，这也体现了讲解员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

有人曾这样描述：一名优秀的讲解员，既是宣讲员、接待员，也是研究员、交际家，他要有播音员的嗓音，主持人的机敏，模特儿的风姿，科学家的智慧，外交家的活动能力。⁽⁷⁾这样的描述略显夸张却也不无道理，讲解员职业是一个集知识积累、语言表达、情感交流等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极强的特殊职业，它对学识水平、心理素质、个人修养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要提高讲解员的综合素质，不仅要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知识文化学习、讲解技巧的培训，开展知识竞赛、举办讲解技巧观摩、比赛、演示等活动，都是提高讲解员职业素质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讲解员所在单位建立一定的竞争激励机制，根据工作情况和德、才、勤、能等表现，进行一定的奖惩，对端正工作态度，提高讲解员职业素质也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注释：

- (1) 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 (2) 马青云、贾志强、杨维中：《讲解艺术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 (3) 邵文斌、杨琦：《博物馆专家型讲解员的定位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博物馆》，2007年第2期
- (4) 杨煜：《博物馆讲解员学者化问题之我见》，《博物馆研究》，2007年第1期
- (5) (6) 蔡文卿：《浅谈博物馆讲解员的心理素质及调节》，大众文艺，2009年第15期
- (7) 王微：《论当代博物馆讲解员的修炼》，《中国博物馆》，2007年第2期

我馆志愿者工作中的多样化探索

撰文/许毅捷

在我馆日常接待工作的开展来看，志愿者的参与已经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志愿者工作也早已成为我馆接待工作的一个传统项目。特别是在世博会召开之后，随着接待岗位的调整，志愿者更是被纳入了日常的岗位安排当中。为了满足接待岗位的需要，除了原来高中、大学的学生志愿者外，我们又成立了一支“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如此多元的组成使得我们改变了现存志愿者工作体系单一，缺乏针对性的状况。为了更好地开展各项志愿者工作，笔者以志愿者组成切入点，综合其各自特点进行分析，同时对实际工作作出初步总结，并提出一些探索性的设想，希望能够对日后志愿者工作的开展有所帮助与启示。

志愿者组成的多样化

现在我们馆的志愿者包括有8所高校的近60名大学生；12个“宋庆龄班”以及2所共建学校的50多位高中志愿者还有来自天平街道、愚谷村居委等20余名社区志愿者，这个总数超过百人的团队在我馆的日常接待工作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多元组成的团队，就其各部分的特点，笔者做了如下归纳。

首先，从他们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来分析。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年轻有朝气，有较高的知识层次，理解表达能力较强，普通话

标准，掌握一种或多种外语交流的能力，这些优势使得他们不仅在我们馆，在很多其他的活动中也成为了志愿者队伍中的主力军。然而，在这些优势的光环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他们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不足，比如容易怯场、场面控制能力比较薄弱、临场应变能力有待提高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们表现出的与游客之间的疏离感，可能是因为从小都是被照顾的对象，对于别人的需要可能不是太能体会，所以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显得不是不够亲和力，这一点倒是社区志愿者做得很好。再来看看高中生们的表现，他们相比于大学生来说，更为年轻和活力，相应的他们的讲解显得较为青涩和稚嫩，应变能力和场面的控制也较为欠缺。相比看来，他们的优势似乎就不是那么明显了，正因为如此，这个讲解员的岗位却给了他们最多的历练和提高。最后要提的就是社区的志愿者们了，和他们相处了近两个月，他们给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仪式上，陆柳莺馆长在致辞。

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的责任感和亲和力，虽说只是志愿者的工作，但他们对于岗位责任的领悟力是相比于学生志愿者成为了他们最为突出的特点；另外，基于丰富的阅历，他们富有亲和力、善于发现游客的兴趣点，我们时常看见游客与他们聊天的场景。要说社区志愿者们存在的不足，就是他们的年龄所造成的生理上的衰退，许是记忆力的不如从前，许是那已不利索的腿脚，与学生志愿者相比，使得他们参与到完整讲解过程的有了一定的难度。综上所述，学生有学生的优势，而中老年人也有着中老年人的特长，他们之间定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但必须以各展所长为基础的，这就需要我们花心思去探索实践了。

之前说的是志愿者们各自的特点，接着分析一下他们来馆动机和希望达到的目的各自异同，这也是针对性开展工作的重要出发点和依据之一。

若说高中生来做志愿者，因为是学校安排的原因，多少有些“被志愿”的嫌疑，那大学生和社区的志愿者们则有着更多的主动性。学生志愿者想通过志愿服务拓展自己的各方面能力，而社区志愿者们则更多的是想要丰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工作中尽可能地让他们各取所需，肯定他们的进步与价值。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是要发挥各类志愿者的长处，争取优势互补；其次把来馆的动机引向正确的方向，从被动到主动，肯定成绩，发展兴趣；最后就是要合理安排工作，尽量能让志愿者们在服务过程中的收益最大化。依笔者愚见，这兴许就是我们开展志愿者工作的依据和目标了。

志愿者岗位的多样化

由于志愿者们差异性，原先我们的岗位安排的局限性开始显现。从传统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志愿者主要是参与讲解的工作，这是由于我们的志愿者原先都是学生，他们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胜任这一工作。而面对社区志愿者这一群体，显然让他们在一周之内对讲解稿做一个完整的记忆似乎有些困难，一来他们记忆力不如年轻人，二来他们的精力多数被家事所占用。于是我们想能不能让他们做些别的，要是能够发挥他们极具亲和力的特长就最好了。在世博会的机缘之下，主楼内安全岗的保安安排增援到了其他的岗位，于是社区志愿者们理所当然地被安排在了安全岗的位置上，在实际操作中来看，似乎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面对少量的游客，有时一两个人，有时是一家子，这些社区志愿者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阅历优势，简单的引领和介绍的同时，更多地与游客进行了良性的互动。他们似乎很容易就能发现游客们的兴趣点进行介绍，有时又会很适时地成为聆听者，想来这其中的拿捏还是需要时间的积淀的。

如此一来，我们的志愿者岗位就有了讲解岗和安全咨询岗两个了，满足了不同的需要，发挥了不同的优势与作用。

志愿者培训的多样化

基于志愿者岗位的多样化，上岗前的培训也必须随之多样化。

原先的培训是针对讲解岗的，所以有很多内容是关于讲解的，比如讲解的起源、讲解的姿势、讲解的发声等等，这些内容对于



故居的社会志愿者

安全咨询刚来显然是不必要的，所以首先我们是对培训内容上做了一些区分。对于学生志愿者，培训的材料包括讲解词、礼仪规范、讲解技巧、常见问题以及馆内的一些规章制度；对于社区志愿者则删减了一些内容，仅包括讲解词、常见问题和规章制度。结合观察实际操作的情况，笔者建议可以在加上一些对于游客人身安全上的知识，比如火警疏散、可疑人员管制等内容。因为原先的安全岗若只为保护文物的安全，现在安全岗还肩负了一个咨询的任务，那对于游客来说，在主楼内这个提供咨询的岗位绝对是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了，特别是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之时。虽这些内容并非常用，但防范于未然是具有相当重要性的

以上内容上的区别，在培训的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区别。学生志愿者的培训是由课堂授课和讲解演示两部分组成的，而社区志愿者则更多的是在实践中去熟练去掌握。这样的区别主要是我们考虑到学生习惯于这样的授课形式，而社区志愿者由于他们离开课堂许久了，再加上岗位的特殊，很难在课堂上给予很好的归纳总结，只能在实践中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

志愿者评价机制的多样化

对于一个志愿者的服务水平的优劣，作为工作人员的我们需要有所掌握，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对于现行的评价体系，我们是以出勤数量为唯一参数的，不论是学生志愿者还是社区志愿者。虽说出勤的次数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志愿者积极与否，但是作为唯一参照似乎还是不够全面性，除了数量，我们似乎还应该关心质量。对于学生志愿者，我们尝试进行随机抽查他们的讲解情况，今年是个特例，由于世博的影响，游客成倍增长，对于志愿者的抽查，我们是有些疏忽，但这项尝试，我们有信心把它开展下去，最终把尝试变成一种常态。但对于社区志愿者而言，他们服务水平的好坏则更多地要取决于他们的服务态度了，这种态度的考评似乎是很难捉摸的，所以，笔者想到了“游客反馈”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并不新鲜，我们宣教部的同仁定期就会进行一次游客意见的调查，但具体在志愿者身上要怎么具体实践，还是有待大家一同商榷，但笔者执意认为作为评价机制的一种，“游客反馈”是个不错的方法。

小结

近百人的志愿者团队，有共性但更有个性，找到其中的差异，因材施教，区别对待似乎是取胜的捷径，笔者仅想通过此文，把一些显而易见的差异和我们实践中的经验做一些总结，对今后工作的开展提出一些设想，力求对以后志愿者工作的完善起到一些帮助作用。

如有不足之处，指正为盼。

宋庆龄与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 战友——杨杏佛

撰文/丁灵敏

在宋庆龄文物馆的陈列中，有一部分是介绍宋庆龄与杨杏佛所创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很多观众并不了解杨杏佛，会针对此人提出一些问题。讲解词上的有关杨杏佛的介绍十分有限，因而笔者通过寻找资料，对观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梳理了宋庆龄与战友杨杏佛在共同的革命经历中建立的坚定的革命友情，试图为以后的讲解和研究提供参考。

杨杏佛和宋庆龄是何时认识的，他们的关系如何？

宋庆龄一生朋友很多，杨杏佛是其中的一位。他与宋庆龄过从较密、见解接近、彼此互相信任、至死不渝。杨杏佛的性格、背景和经历虽与宋庆龄不同，却与她追求共同的政治理想，并为之献身。

杨杏佛名铨，字杏佛。1910年秘密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曾任总统秘书处收发组组长。1912年12月1日他抵达美国，与宋子文同为孙中山批准的稽勋留学生。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商科硕士学位后回到祖国。

杨杏佛曾经做过孙中山先生秘书。1924年11月21日随孙中山、宋庆龄一起至上海。孙中山在北京患病期间，杨随侍在侧，孙中山逝世后，杨参与了治丧工作。1925年4月10日，随宋庆龄、孙科赴南京勘察紫金山

墓址。4月18日，孙中山先生的葬事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上海设立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并推举杨杏佛为主任干事。在这段时间，宋庆龄与杨杏佛接触较多。他们都曾是留学美国的学生，习惯用英语交流，互相之间颇多共同语言。同时宋庆龄也看到杨在处理孙先生后事及陵园工程等方面的表现，对他的廉洁奉公和工作效率有了认识。

宋庆龄与杨杏佛共同的革命经历

1. 共同发表抗议英帝制造的“五卅惨案”的声明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英租界巡捕枪杀抗议日本工头杀死纱厂顾正红和游行队伍中的工人和学生事件（即“五卅惨案”），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宋庆龄拟即发表声明表示抗议。杨杏佛与宋庆龄都认为当时的北洋政府不可靠，租界内高等华人和商业巨子有所畏惧，也难指望他们主持公道。只有对外揭露真相，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对内唤起国人的民族精神，作长期奋斗，才能最终取消不平等条约，以求国家独立。为此目的，在宋庆龄的支持下，杨杏佛办起了《民族日报》。撰写社论抨击日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反对军阀名流的媚外，还总揽编辑、校对，拼版。《民族日报》与其他爱国反帝报纸并肩作战，相互呼应，出版16天后同时被租界和华界当局勒令停刊。

2. 宋庆龄在柏林邀请杨杏佛携眷赴德协助设立中国新闻机构。

1927年武汉政府结束后，宋庆龄经上海去苏联。后又前往德国，在柏林小住。在此期间，杨杏佛因于北伐军攻上海时，支持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为国民党右派所不满而被解除孙中山葬事筹备处总干事职。1927年10月，蔡元培聘他为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1928年8月21日，宋庆龄写了一封长信给杨杏佛，地点为Berlin W. 15, KURFUS TENDAMM25。宋庆龄习惯用英文写信，其中宋庆龄提到的部分内容翻译成中文是：既然你已最终想清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组织，那你与它的关系越快断绝越好。可能共产党员是对的——只有他们的党能实行孙博士的主义。我早就想劝你想方设法将全家带到德国来，首先因为可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学到许多通用于中国建设的東西，其次这里是生活费最低的国家，德国人民对外国人非常民主和友好。这是第一封宋庆龄寄给杨杏佛邀请他赴德的信。

1929年11月宋庆龄又在柏林写信给杨杏佛，宋庆龄在信中提到：我一直在试图说服人们在欧洲设立一家中国新闻机关的必要性。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报纸经常散布对我们不利的新闻，而我们却没有办法去纠正！如果我的建议你能接受，我希望你和杨夫人一起到欧洲来帮我做这件事。我心中已有可信赖的外国人来帮助我們，你会喜欢这个工作的，因为它使你经常接触时事，同时也让我们有时间在欧洲作一些调查和旅行。这是宋庆龄第二次写信邀请杨杏佛赴德。

3. 并肩营救政治犯和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宋庆龄与杨杏佛共同创立的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权组织。在和杨杏佛的共同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庆龄对杨杏佛的信任和对他勇于负责的精神的钦佩。

1931年8月，宋庆龄回到祖国，又与杨杏佛一起共同参与了营救牛兰夫妇和邓演达的斗争。国民党特务则在他们的刊物上多方造谣挑拨离间。针对这种形势，宋庆龄写信给杨杏佛，说她因对邓演达和牛兰夫妇案的关注收到很多卑鄙的信件。但她在信末强调任何攻击都动摇不了我对你忠于革命的信心。1932年12月，宋庆龄、杨杏佛、蔡元培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该组织营救了很多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1933年3月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作为主要成员之一的国民御侮自救会在八仙桥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宋庆龄、杨杏佛、李建华、吴迈都参加了大会。宋庆龄在会上发表号召人民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讲话。当时国民党特务已经通过不同渠道恐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重要成员，威胁他们如果不停止活动将采取断然措施。杨杏佛于1933年4月15日在《申报》上发表讲话，除对租界当局搜查国民御侮自救会会所，及该会讲演员私人在浦东被捕表示关注，并推沈钧儒律师向租界当局交涉外，还特别提出御侮自救会之主席虽推定为宋庆龄先生，惟宋氏因其在其他工作不能兼顾，始终未允担任。至蔡元培霞安生，则既非该会发起人，亦非该会职员。外传为该会中坚分子，殆传闻之误也。杨杏佛用于负责，掩护同志之情，溢于言表。

（下接第55页）

“邓广殷及其家人收藏的宋庆龄书信展”筹办心得

撰文/宫洁菁

本馆于今年5月底至6月初在临时展厅举办了“海纳百川 明德惟馨——邓广殷及其家人收藏的宋庆龄书信展”。这是本馆首次举办书信专题展，从内容设计、形式设计，到制作展板及最后的实地布展，每个步骤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展览推出后受到邓广殷先生本人及社会各界的好评。笔者全程参与了此次展览的筹办，对展览的特点及个人的体会作如下阐述。

一、紧扣“书信”的特点撰写陈列大纲、制定陈列方案。

书信展的主要展品是书信。观众进入展厅，印入眼帘的必然全是文字，因此为了不使展览显得单调、枯燥，必须提炼出一个鲜明的主题思想，并且划分清晰的陈列结构。每个单元都要有详细的单元说明，以引导观众理解书信的内容。

这次这批书信有200多封，横跨10年时间。就内容而言，属于“家信”，比较琐碎，没有中心思想。反复阅读这些信，又参考了一些比较权威的著作，最后我们认为“海纳百川 明德惟馨”八个字能够概括这些信中体现出来的宋庆龄的品质。由于内容分散，同一事件可能出现在多封信中，同一封信里也可能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所以，按照内容划分单元的难度较高。考虑到这次办展的目的，我们最后决定以收信者作为依据划分，也就是划分成“宋庆龄致邓文钊

信”、“宋庆龄致邓广殷信”、“宋庆龄致邓勤信”三个单元，这样更能反应宋庆龄与邓家的关系，也契合“海纳百川”的主题。

有了既定的主题和框架，就要开始选择展品。受限于展厅的面积，190多封信里参加展出的肯定只能是一小部分。一方面根据主题思想，一方面考虑整封信涉及的内容是否适宜公开，另一方面顾及版面的形式（纸张和字迹的颜色），我们确定了60多封信，另外还选择了一些相关的实物以增强可看性。书信上墙，实物则入展柜。

陈列方案的确定是经过反复酝酿的。

排版是首要问题。展览分为三个单元，每个单元的书信，可以直接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列，也可以根据信的内容再划分小单元，按主题摆放。当然如果按主题摆放的话，势必还要有一个小单元说明。事实上展览本身就已经有很多文字，前言、结语、单元说明、包括信件本身也是文字，如果再划分多级单元，那么墙面上的文字内容就太多了，显得杂乱。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墙面上的信直接按照时间顺序来摆放。对于宋庆龄在这批信中反复提及的问题以及我们认为很有意义、应该着重宣传的几项内容，仍单列出来，把涉及这几个主题的信集中在一起，附上事情的前因后果，但不摆在墙面上，而是放入展柜。一个展柜一个主题。如此一来，既不破坏墙面展板的效果，又可突出重点；引导观众领会展览想表达的主题，同时也给

他们自由理解书信内容的空间。

说明牌如何撰写也是一个问题。在国内展出英文信件，应该要有有关信内容的中文说明牌。但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由撰写者概括整封信的内容，制作一个说明牌；一种是节选信中符合主题的一部分内容，直接翻译成中文制作说明牌。第一种方法可以让观众更迅速地接收到整封信传递出来的信息，但不是宋庆龄的原话，是经撰写者演绎过的二手资料；第二种方法则是直接把信中宋庆龄的原话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自己理解。我们认为，既然是书信展，观众更多的是想看到书信的内容，想了解宋庆龄在信里是怎么写的，而不是我们的主观概括；何况宋庆龄的信有些地方是写得颇有文采的，非常生动有趣，没有道理把“原汁原味”的东西抹杀掉。所以最后我们采取了第二种方法。而展柜里的书信，因为是要重点突出的，所以说明牌的内容包括撰写者对整件事情的叙述以及宋庆龄信的原文两个部分。这样观众能按照我们提炼的主题去理解这些信，又能够从信的内容里得到印证。

二、形式设计由本馆人员亲自完成

一般情况下，在完成了陈列大纲和方案这部分的内容设计后，就可以提交制作公司进行形式设计了。但根据之前的几次办展经验，我们发现有时候制作公司往往很难理解我们馆方在展览中所要表达的精神和意境，双方反复沟通，几经周折，还是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尤其是对于临时的小展览，他们似乎无暇投入过多的精力去设计。所以，我们这次尝试挑战由部门人员自己在电脑上绘制展板效果图。这样跟制作公司反复沟通的步骤就省略了，可以直接进入制作，

节省时间，也避免了沟通不畅。

在绘制展板的过程中，我们确定了前言、结语以及说明牌的字体、字号、底色、底纹，所有书信按照“疏密有致”的原则确定摆放位置。

事实证明，对于这种单一的专题展，我们自己做设计并非不可行。最后制作公司只是从专业的角度提了一些对齐方式上的问题，整体布局没有改变，达到了我们预想的效果。

三、根据实际情况尝试新的陈列方式、展板材质。

书信如何上墙是展览制作阶段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为此我们专程外出参观了几个类似的陈列，基本上都是把信纸放在玻璃和木板中间，四周用螺丝夹紧，木板背后安一个挂钩，挂在墙上。

与制作公司接洽后，他们提出了一种我们以前没有采用过的，更为便捷、经济的方式：用上下两根嵌条把信夹在有机玻璃跟雪弗板中间，雪弗板和有机玻璃比较轻，可以直接用双面胶固定在墙上，最后用热胶加固。之所以使用热胶，是因为它凝固后很容易去除，不伤墙面。固定雪弗板的双面胶背面也会事先覆盖一层即时贴，这样就不会有双面胶粘在墙上的后患。



综合考虑了造价和展览的展期较短等因素，我们接受了这种方式。

四、现场布置，做最后的微调。

布展是实现陈列计划的决定性步骤，是一个边布置、边研究、边提高的过程。展柜摆放位置的调整就是在这时候进行的。根据实际效果，我们在不影响展览主题的前提下临时删掉了一封信和两个展柜，另外两个展柜则增加了几件实物，使得整个展览更加紧凑。

回顾展览制作和布置的过程，笔者认为有些经验是值得以后办展时借鉴的。

首先，事先确认展板的实际效果。

形式设计是在电脑上完成的，与设计公司的来回几次修改也是通过电脑。最后他们递交定稿，我们在电脑上确认后，就直接进行制作了。或许是每台电脑显示器显示的色彩有差别，也或许是制作公司的疏漏，最后送来的展板的底色跟我们设想的颜色是有出入的。虽然整体效果没有发生改变，但终究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颜色。这提醒了我们，不能过分依赖电脑，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求制作公司提交实物的小样，在小样的效果得到认可之后才可以开始制作，而且必须严格按照小样制作。

其次，充分考虑展厅的布局。

馆内的临时展厅不大，呈非常规则的长方形，展线流畅，不存在障碍物。但在布展接近尾声的时候，保卫干部告知，其中一面墙是有一扇暗门的，里面是弱电机房。这一点在绘制展板效果图时被忽略了，所以有两封书信正好把这扇门给固定住了。这时候再调整位置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所以最后不得不撤掉一封书信，才使版面的改动

缩小在最少的程度。所幸一封书信并不影响展览的整体内容。但这的确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办展，尤其是馆外的巡展，不仅要了解展厅“显性”的布局，更要全面考虑到一些“隐性”的因素。

最后，探究更合理可行的陈列书信的方式。

就书信等纸制品的陈列方式而言，我们采用的方法是有待改进的。“宋庆龄文物馆”改版时，我们制作滑轨，两块玻璃插在滑轨里固定，信和文稿夹在两块玻璃中间，但滑轨与玻璃的贴合不严密，导致玻璃间有缝隙，时间长了纸会往下掉，所以要用双面胶来把纸固定在玻璃上。这次书信展我们采用了简易的方法，用嵌条夹住雪弗板和有机玻璃，中间放书信，雪弗板不光滑，跟信纸之间有摩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固定的作用，但是它很软，经热胶跟墙面固定后，就会变形，无法完全贴合有机玻璃，书信还是会往下掉。两次展览都很无奈地用到了双面胶，事实上这种方式很是不妥，粘胶会对文物原件造成损坏，而且双面胶时间长了会发黑，从纸的背面显现出来，很难看。即使粘很少一点，撤展时把这一点胶去掉也颇费功夫。我们确实应该寻找一种更加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考虑造价和便捷程度，而忽略了展品本身。

通过这次书信展，我们不仅对书信的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也积累了办展的经验。展览的每个步骤都很关键，陈列设计是灵魂，制作和布置则是桥梁，一个好的展览必定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汲取了这次的经验，今后我们再举办类似展览就更加胸有成竹了。

宋庆龄的诗

撰文/麦灵芝

宋庆龄是二十世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写过很多时论文章，却很少写诗，宋庆龄曾说自己“是一个并不擅长写诗的人”⁽¹⁾。的确在她80多年的人生中从不刻意去写诗，因此留传下来的诗很少。搜寻和品读她仅有的几首诗，依然能让我们了解她不同时期的情感世界和文采。

致珍妮

她，珍妮，是个很甜的姑娘，
这个很甜很甜的姑娘就是我的珍妮，
她像一朵百合花那样端庄、腼腆，
所以，她是最可爱最可爱的珍妮。

谁能把这朵百合花采到手，
谁就是幸运的宠儿。
这朵迷人的百合花啊，浑身都没长刺，
那么纯真，那么自信，
这不就是住在这间屋子里的她么！

她需要爱抚，她需要温存，
她老爱呆在的地方是那绿树之下的浓荫。

啊，珍妮，你这个玲珑娇小的朋友，
就是我亲爱的蜜蜂。⁽²⁾

这首诗可能是宋庆龄最早的一首诗，写于1909年6月19日，是她在给美国同学珍妮·多特里的信中写的。1907年8月至1913

年5月宋庆龄在美国留学，先在新泽西州萨密特镇的波特温学校学习法文和拉丁文，一年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到美国后宋庆龄很快融入了当地社会，和同学们相处也很好。珍妮是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美国同学，宋庆龄称她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姑娘。宋庆龄想用“不寻常”的词句来表达对她的印象，于是写了这首诗来赞美她。宋庆龄用百合花来赞美珍妮的纯洁清新，用蜜蜂来比喻她是酿造甜蜜的可爱姑娘。在信中宋庆龄告诉珍妮：这首“美妙”的诗是一个“美妙”的姑娘在一个“美妙”的世纪、一个“美妙”的年头的一个“美妙”日子写的。可以看出当时宋庆龄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充满快乐、无忧无虑。诗中反映的正是她16岁花季年华的纯洁与美好，流露的是她青春洋溢的少女情怀和年轻快乐的心。

受难的世界在灾变中抖动。
它那丰腴的大地被法西斯罪恶的
锯齿斧砍得体无完肤，
神圣的山峰在明日的死亡狂潮中
变得昏暗，
而中国热情的黄河里
每天涌流着无辜人民的鲜血，
无情地将大地染成似酒的紫色，
那是嗜血成性的野蛮人喷洒的。⁽³⁾

……

这首未完成的诗是宋庆龄在写给杨孟东的信中所作，写于1944年4月10日。杨孟东是出生在夏威夷的美籍华人，二战时期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参谋长史迪威的少校侍从副官，因为杨孟东的祖父与孙中山是同乡，叔父杨仙逸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航空局局长，但英年早殇。宋庆龄在重庆和杨孟东相遇后一见如故，对这位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后代格外的亲切，把他当亲人一样疼爱。当杨孟东被派到缅甸前线作战时，宋庆龄时常给他写信。在缅甸战场上，杨孟东对战争的惨烈，心中倍受煎熬，含泪给宋庆龄写信，宋庆龄便回信鼓励他多多杀敌。1944年4月10日宋庆龄得知杰克·钱皮恩上校要去印度，并愿意帮忙带信后，便匆匆给杨孟东写信，即兴写了这首诗，控诉了侵略者的野蛮行径，激励杨孟东的杀敌热情。因为时间匆忙，这首诗只写了一半，宋庆龄表示总有一天要完成这首诗。日后宋庆龄还写信询问杨孟东对这首诗的看法，只是不知宋庆龄最终是否完成了这首诗。但光从这首未完的诗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她对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对全世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强烈谴责，对山河破碎，国难深重的哀恸和悲愤。

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向人民的胜利致敬！

这是我们祖国建设和前进的动力，我们的旗帜是“生产”更多的生产。向人民的力量致敬！

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

暗角落。

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这是胜利的高潮，荡漾到每一个口岸。各国人民的人民运动风起云涌，把我们的力量和他们的合在一起，加强这勇敢的战斗。向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

这一次胜利的战士们的力量增强了。他们的英勇，无匹；人们的心，同老百姓的心连在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敬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⁴⁾

这是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写的贺词，贺词以散文诗的形式表达了她对中国共产党的心声和迎接新时代的喜悦。1949年6月上海解放不久，中共华东局统战部准备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纪念大会。会前，陈毅市长派周而复专程前往宋庆龄的寓所拜会，邀请宋庆龄出席“七一”纪念会。周而复来到宋庆龄的寓所，先向宋庆龄表示问候，接着表明了来意，介绍了“七一”纪念会的内容安排，并呈上请柬。宋庆龄听后连连点头说：“好，好的。”并说：“我也很想和同志们见见面。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也讲几句吧”。于是她认真地准备“七一”纪念会的贺词，宋庆龄用英文写完后，请柳无垢翻译成中文，再亲手抄写了一遍。6月30日下午6时，宋庆龄抱病参加了在逸园饭店举行的“七一”纪念会，因为身体不适，

便请邓颖超代她宣读了贺词。7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宋庆龄的这篇贺词。

无名烈士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过去很久的日子里，
九个无名的中国妇女，不肯屈膝，不肯
低头。

她们反抗，为了人民，
她们献出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她们之后的年代里，
更有千千万万像她们似的继承者，
燃烧着革命的火焰，
裹扎起战斗的创伤，
在人类新时代的歌声中向前迈进。
许多人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
我们为那九个无名的妇女树立起碑石，
为了敬仰她们，也为了敬仰所有的中国
妇女。

我们今天纪念过去，但也展望未来；
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着明天，
为了所有的人民。

这首诗是宋庆龄应约为纪念九名反清的
太平军女兵而作的，写于1953年12月。武汉
的东郊有一片秀丽的湖光山色，称作东湖。
1950年当地政府为配合新中国的经济文化
建设及发展园林事业，设立了东湖风景区管
理处。东湖的西北边有个叫九女墩的地方，
相传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时，清军围攻武昌的
起义军，太平军中的九位女兵，英勇抵抗，

不屈牺牲。乡人敬慕她们的义烈，将九位女
兵的尸首埋葬在东湖岸边。为避清廷的迫
害，将坟改称为墩，九女墩实际上是九位不
知名的太平天国女兵的葬身之地。1952年东
湖风景区管理处为保存东湖、洛珈山的名胜
古迹，发扬革命传统，在九女墩竖立了纪念
碑，并请当时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和郭沫若
两位题写了诗文，因尚余一面碑石空着，于
是中南行政委员会于1953年9月8日函请宋庆
龄为九女墩纪念碑题词。武汉是辛亥革命的
首义之区，纪念者又是反清的革命女先烈，
宋庆龄很快同意，并于12月专门撰写了英文
诗《无名烈士》。这首诗译成中文后由何香
凝书写，勒石在九女墩纪念碑的东面石碑
上。宋庆龄在诗中赞美了哪些反抗压迫、英
勇不屈的中国妇女，并激励无数的后来者努
力建设美好的新时代。

一万万双手

我们两国山水相连，
我们的人民心心相印，
世代和睦如兄弟，

印度、中国
两个觉醒的民族。
北京、新德里
正在崛起的新亚洲。

和平与友谊啊，
一万万双手是你的保卫者！

印度、中国是兄弟！
印度、中国是兄弟！⁽⁵⁾

诗稿的下方写有：“作于1957年1月，
为纪念1955年12月我出访新德里时所受到的
热情友好的欢迎而作”。1955年12月16日至
1956年2月4日，宋庆龄应邀对印度、巴基斯

坦、缅甸进行了为期50天的友好访问，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访问取得很大的成功。回国后宋庆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了《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三国访问报告》，刘少奇评价说：“宋副委员长继承孙中山先生们的革命传统，反对殖民主义，主张独立自主，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她到这些国家去，做了很好的工作，起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⁶⁾宋庆龄这次连续访问了三个国家，却唯独写诗纪念访印之旅，足以见得印度人民的真诚与盛情，对她打动最深。就如宋庆龄自己所说：“在访问期间，无论我到哪里，人们都用印度人和中国人是兄弟这句话欢迎我，这表示了发自内心的共同呼声。”⁽⁷⁾她希望让这种呼声永远在心里萦回，所以在这首诗中她重复用这句话，抒发她对印度人民的友好情谊，同时又以“一万万双手”作题表达她对捍卫和平与友谊的坚定信念。

宋庆龄一生留下的诗不多，时间跨度却很长，这些诗可以成为我们了解她的另一个新的视角。从这几首诗创作的语言来看，都不是用中文，而是用英文来写的，以此我们可以了解她平时的阅读、写作习惯。宋庆龄从小接受系统完整的西式教育，中文学习却时断时续。对她而言，中文的掌握和应用远不如英文那样自如，所以英文俨然成为她一生中阅读和书写的第一语言，她作诗时自然也就选择用英文了。从这五首诗的体裁来看，显然都是新体诗歌而非古体诗，其中有四首是自由诗的体式，一首是散文诗的体式。自由诗和散文诗都是运用比较自由的形式抒写心意，不讲究押韵与格律，只注重诗歌所表达的意象和传递的情感，只是散文诗比自由诗更加自由一些，二者都源自于近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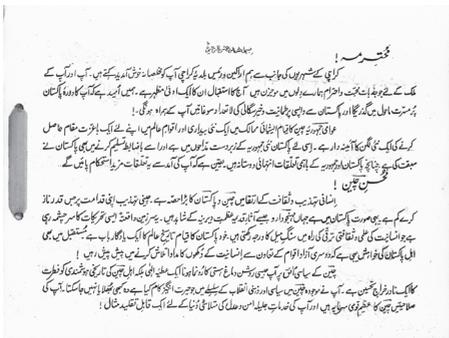
以来的西方文学。宋庆龄选择这两种体裁来写诗，应该也与她一生接受更多的西方文化有关。从这几首诗的内容来看，没有对风花雪月的矫情，有的只是她对身边的人与事的感怀，她用诗来赞美朋友、谴责敌人、抒发对新时代的喜悦、表达对友谊的感动。尽管宋庆龄说自己是个不擅长写诗的人，平生作诗也不过数首，但光从其创作内容和艺术精神上，诗中表现出的真纯、朴实的情感内容和个性化的思想内涵，已经足以显示其精神境界和艺术品位了。作为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宋庆龄一生写过不少时论文章，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常常是一个有着坚定的意志和信念的理性的她，而在一些特别的时候，她又会选择用诗歌的语言和思维来完成情感的表达，从这些诗中或许我们可以更多地触到她心灵深处情感丰富的感性一面。

注释：

- (1) 致珍妮1909年6月19日，《宋庆龄书信集》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 (2) 致珍妮1909年6月19日，《宋庆龄书信集》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 (3) 致杨孟东1944年4月10日，《宋庆龄书信集》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 (4) (5)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
- (6) 《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
- (7) 《人民日报》，1956年1月1日

从馆藏藏品解读 宋庆龄与中巴关系

撰文/宫洁菁



于解开了。

内页上的文字大意是：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

我代表卡拉奇市民热烈欢迎中国贵宾，我相信您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会带来好运气。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亚洲和全世界人民是一件好事，巴基斯坦也喜欢中国，也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这也让中巴关系友好发展并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巴基斯坦也有几千年的历史。我希望中国和巴基斯坦为全球独立而合作，共同解决人类的痛苦。中国像您这样的领导人证明了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您对中国政治革命的贡献不能忘记。您是中国财宝，为自己国家的和平做出的努力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为能有机会欢迎你，共度这段美好的时光感到非常荣幸，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为您服务，为中巴友谊做出贡献。

马利克·巴格·阿里

显然，这是宋庆龄1956年1月24日至2月1日率团出访巴基斯坦，出席首都卡拉奇市举办的欢迎会时，卡拉奇市市长马利克·巴格·阿里所作欢迎词的书面原稿。可能当时与会的贵宾每人都有这样一份册页，可以在市长宣读的时候翻阅，也可以留作纪念。

馆藏藏品中有一份册页，印刷精美，纸质考究。从封面和封底的图形及英文单词可以判断，这份册页来自巴基斯坦，卡拉奇。可由于内页全是巴基斯坦文字，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无从知晓。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与同事一起造访了位于虹桥地区的巴基斯坦驻上海总领事馆。在领馆内，我们受到了总领事扎尔先生的热情接待。总领事用他那不算流利但足以让我们啧啧称奇的普通话把册页全文给我们翻译了一遍。至此，一个困扰我们很久的谜团终

宋庆龄将这份普通的会议欢迎词跟其他重要文献一起保存了下来，可见她对这次欢迎会的重视，她对卡拉奇，对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是存有感情的。那么宋庆龄与巴基斯坦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中巴友谊建立、疏远、加深、牢固的各个不同时期，宋庆龄又起过怎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就这些问题在本文中作个详细的梳理。

首先让我们把视线放回到上世纪50年代。

宋庆龄在国际交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亚洲一家”、合作奋斗的主张，从来都很重视小国对和平的贡献，尤其重视周边国家的积极作用。⁽¹⁾1955年底至1956年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应邀率团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三国。

巴基斯坦是宋庆龄此次亚洲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新中国与巴基斯坦虽早在1951年就正式建交，但关系并不密切。两国的特殊友好始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与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的会晤奠定了中巴友谊的基础。而此次宋庆龄的巴基斯坦之行无疑是为了给中巴关系再次升温。

1956年1月24日，宋庆龄一行由缅甸仰光到达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开始了对巴基斯坦为期9天的友好国事访问。宋庆龄在卡拉奇、西巴基斯坦首府拉合尔、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分别作了停留，访问巴基斯坦制宪会议，旁听关于宪法草案的辩论，还接受了达卡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在前文所提到的卡拉奇市欢迎会上，阿里市长还将一把象征“卡拉奇市公民权”的金钥匙赠送给宋庆龄。1月29日，宋庆龄在巴基斯坦电

台发表广播演说，她深情地说道：“虽然我这次在这里的访问时间很短，但是，我对贵国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以及你们所给我的殷勤招待已经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从我同你们总理、部长们和其他著名公众领袖的面谈中，我得出了这样的信念：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将会而且必须加强。这不能不促进世界和平事业。这一定会对我们两国的繁荣和幸福有所贡献。我们的友谊万岁！”⁽²⁾宋庆龄的这次出访充分显示了我国与巴基斯坦加强友好关系的美好愿望。

3月10日，宋庆龄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作《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三国访问报告》。刘少奇在会上高度评价了宋庆龄为开展国际友好活动所作的贡献，谓：“宋副委员长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反对殖民主义，主张独立民主，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她到这些国家去，做了很好的工作，起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³⁾

宋庆龄回国后不久，即同年10月，巴基斯坦总统苏拉瓦底回访中国。中巴两国的友谊如愿再次向前迈进。当时宋庆龄刚结束一系列密集的外事出访和接待工作，在上海家中休息。苏拉瓦底总统遂于10月26日由北京抵达上海，参观了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向近4000名孩子们发表讲话，还捐赠了500英镑给少年宫。第二天，宋庆龄邀请总统及其女儿一行在她的上海寓所共进午餐，双方互赠礼物，相谈甚欢。⁽⁴⁾

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首次访问巴基斯坦。双方发表联合公报。至此，以宋庆龄出访为契机，中巴两国在政治领域的理解、交流、合作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本馆去年举办的“宋庆龄寓所国务活

动礼品展”中，巴基斯坦赠送的礼品有两件，一套银质餐具以及一枚金质纪念章。或许这两件礼品不是最贵重，也不是最精美的，但它们跟卡拉奇市市长的书面欢迎词一样，出现在中巴关系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彰显了宋庆龄在此期间所起的重要作用。

6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印度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巴两国关系一度低迷。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出于一致的利益，两国友谊的重要基石得以建立。随后两国同时发布新闻公告，确认进行边界谈判，双方关系出现很大转机。

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再次出访巴基斯坦，力图改善两国关系。

作为回应，次年3月，时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阿尤布·汗到访中国。3月8日，阿尤布·汗总统抵达上海，宋庆龄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次日，宋庆龄在自己的寓所会见了总统，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陈毅、曹荻秋等人。⁽⁵⁾阿尤布·汗总统向宋庆龄赠送了一套精美的银质餐具，也就是现在收藏在本馆的这套餐具。

这套餐具由两个有盖的汤盆和一个椭圆形的盘子组成。盘和盆的四周都有一圈雕花，盘中央的纹饰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国徽。餐具的做工十分精湛，虽历经岁月的打磨，银质表面仍然光可鉴人。

一份简单的礼品，一次短暂的会面，足以证明宋庆龄在新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独特地位。无论是1956年的苏拉瓦底总统，还是1965年的阿尤布·汗总统，来访中国，上海、宋庆龄的寓所，是必经的一站，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国家副主席”的尊重，还有对于宋庆龄本人的景仰。作为女性、非党人

士，宋庆龄所发挥的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1966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频繁的领导人互访为两国友谊的加深再次制造了一个小高潮。

70年代后期，中巴关系几经波折趋于稳定，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加深。

1976年12月，宋庆龄在北京人大常委会接见厅接受了巴基斯坦总统的法兹尔·伊拉希·乔德里委托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索赠送的一枚金质纪念章，为纪念巴基斯坦创始人默罕默德·阿里·真纳诞辰一百周年而制造。⁽⁶⁾也就是我们在“宋庆龄寓所国务活动礼品展”中所展出的这一枚。

这枚纪念章本身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它的正面是巴基斯坦建国运动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正面头像，头像下方的阿拉伯数字1976表示纪念章制造于1976年；纪念章背面是巴基斯坦著名的“独立纪念塔”，以星月为背景象征着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以及光明和进步，四周的一圈英文意为“1976庆祝默罕默德·阿



金质纪念章

里·真纳百年诞辰”（BIRTH CENTURY CELEBRATIONS OF QUAID-I-AZAM MOHAMMAD ALI JINNAH-1976）。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是巴基斯坦的缔造者，著名的穆斯林民族主义领袖。1876年生于卡拉奇一个富商之家，1896年加入印度国大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913年加入“全印穆斯林联盟”。进入政界初期，真纳致力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政治联合；1921年与国大党决裂，不再主张两个教派的合作。1940年3月，真纳在全印穆斯林联盟拉合尔年会上提出建立“巴基斯坦”，主张西北和东北印度伊斯兰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即“巴基斯坦纲领”。真纳为实现这一纲领作了不懈的努力。1947年印巴分治后，真纳任巴基斯坦自治领第一任总督。1948年9月11日，因心脏病逝于卡拉奇。⁽⁷⁾巴基斯坦著名学者G·阿拉纳曾给与真纳这样的评价：“真纳的卓越贡献，就在于他指导我们的民族度过了那个时代并达到胜利的彼岸。由于这一贡献，我们民族理所应当尊他为国父。真纳和巴基斯坦如此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倘若缺少一个，那另一个就根本无从谈起。”

早在1956年1月，宋庆龄出访巴基斯坦的时候，曾在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的陪同下访问真纳的妹妹法蒂玛·真纳女士，一位是巴基斯坦国父的妹妹，一位是中华民国国父的遗孀，我们从现存的照片不难看出，两人的交流是非常愉快的。二十年后法兹尔·伊拉希·乔德里总统赠送真纳诞辰百年纪念章给宋庆龄，显示了巴基斯坦对这位杰出的中国妇女的重视和尊敬，当然也表明了巴基斯坦与中国交好的信心和决心。

此后中巴关系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直

至今日，巴基斯坦人民仍是中国人民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

纵观中巴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50年代初建交；50年代中后期关系升温；60年代初发生嬗变；随即出现好转契机；70年代后关系不断加深。不难看出，宋庆龄在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虽然她不是政府的行政官员，但她所做的事情却是行政官员所代替不了的。她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国访问，也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在自己的寓所款待贵宾，她用她固有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个人声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替中国赢得了所有人的掌声和尊重。

注释：

- (1) 尚明轩：《宋庆龄的后半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 (2)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
- (3) 《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4页
- (4) 《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8页
- (5) 《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2页
- (6) 《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7页
- (7)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2009年12月5日，[HTTP://ZH.WIKIPEDIA.ORG/ZH/%E7%A9%86%E7%BD%95%E9%BB%98%E5%BE%B7%C2%B7%E9%98%BF%E9%87%8C%C2%B7%E7%9C%9F%E7%B4%8D](http://zh.wikipedia.org/zh/%E7%A9%86%E7%BD%95%E9%BB%98%E5%BE%B7%C2%B7%E9%98%BF%E9%87%8C%C2%B7%E7%9C%9F%E7%B4%8D)

关于李燕娥的二三事

撰文/吴颖嫣

在游客服务中心这一岗位上已有1年多了，常有游客在参观主楼听完讲解员的介绍后，会到这边来询问一些问题，多数问题是关于主楼的历史、宋庆龄的一些情况，但也会有很多游客问到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跟随了宋庆龄大半辈子的保姆李燕娥。

笔者针对一些常见的提问，通过对馆藏文物背景资料，宋庆龄的来往书信以及部分内部资料的查阅、研究，整理出了一些李燕娥的相关问题及其相应的答案，期待为以后的讲解和研究提供依据。

常见问题一：李燕娥的具体出生日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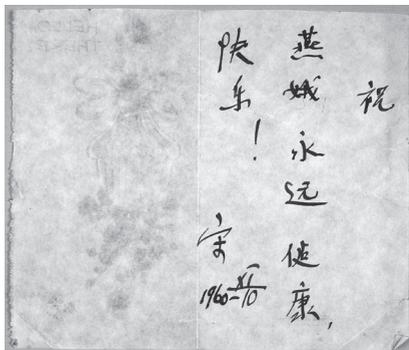
在故居馆藏文物中有一张宋庆龄致李燕娥的贺卡，《孙中山宋庆龄文物图录中》提到这张贺卡是1960年11月10日李燕娥48岁生日时宋庆龄送给李燕娥的，在注释中写道了李燕娥的生卒年份为（1912~1981）年。⁽¹⁾

那么李燕娥的出生日期是否就为1912年11月10日呢？正在笔者准备将这一日期定为确切答案的时候，笔者又看到在2010年第1期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以下简称《动态》）刊登的《对〈品质高洁 唯菊与石——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一文错误的更正》中这样写道：“李燕娥的生卒年份应为（1911-1981）。……”⁽²⁾

在这里关于李燕娥的生日就出现了两个

不同的说法1911年1912年，究竟以哪个作为推断的标准呢？为此，笔者针对周和康老先生这篇文章，特地致电周老先生本人。在电话中老先生告诉笔者，他是在1956年初，由组织安排到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寓所当管理员的。他所撰写的这篇文章中关于李燕娥的出生年份是在平日里和李燕娥聊天的时候聊到的。

笔者随后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比对翻查，认为周和康老先生的这个说法更为准确，因此在这里，笔者就将1911年作为李燕娥生日



的年份。

确认了年份后，笔者对李燕娥生日的日期又进行了考证，笔者发现自从1967年冬天起，由于宋庆龄常住北京，她和李燕娥之间便书信不断。在临近李姐生日的前几天，宋庆龄总会亲笔写信给上海住所的管理人员，托他们买只鸡和水果，还附上生日卡，为她祝寿。在一封宋庆龄在1971年11月8日写给周和康的信件，信中这样写道：

周同志：

你好！现在要托你办一件事，旧历十月十日是李燕娥同志的生日。她在我处服务了快40年了。我应该对她忠心耿耿的工作有些表示。请在九日那天，代买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2斤香蕉送给她（连这张贺卡）。多谢你！

宋庆龄”⁽³⁾

上面这封信中宋庆龄提到了李燕娥的生日是旧历十月十日，这不可谓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那么什么是旧历⁽⁴⁾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旧历的概念：旧历也称作农历，是时间的一种计算方法。所以宋庆龄在信中所提到的“旧历十月十日”也就是指1911年的农历十月初十。

笔者随后查阅了万年历，1911年的农历10月10日对应的日期11月30日。由此确定李燕娥的出生日期为1911年11月30日。可见，贺卡上的11月10日可能只是当时宋庆龄寄出的日期，并非李燕娥的生日。

常见问题二：李燕娥是几岁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当时宋庆龄几岁？

“李燕娥是广东人，十八岁时由孙中山先生的亲戚介绍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与宋庆龄相伴五十多年，直到七十岁去世。”

这是故居主楼李燕娥卧室的讲解词，一般在游客问到李燕娥的一些情况时，讲解员都是以讲解词作为基础予以回答的。

但在《动态》上刊登的《对〈品质高洁 唯菊与石——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一文错误的更正》中，对于李燕娥的注释却是这样写的：

“……1927年，她16岁时，由与首长关系比较密切的谭洁怀的母亲谭妈介绍到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首长身边为保姆，陪伴首长度过了54年。”⁽⁵⁾

上段文字提到了，李燕娥是1927年16岁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的，然而在《往事与情缘——李云回忆录》中，却有这样一段文字：

“……1931年8月，我从德国回来，因为母亲去世了，过了几个月是一位朋友将李妈介绍给我的。当时她还很年轻，二十出头一点。……”⁽⁶⁾

两段文字都提到了李燕娥来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时间，究竟以那个版本作为这个问题的依据呢？在笔者与周老先生的通话中，他也提到关于李燕娥来馆工作的时间，老先生告诉笔者，这个李燕娥在平时都和他有聊过，而且在最后周老先生还特别肯定的告诉



李燕娥和寓所工作人员周和康、杜述周

笔者，有关李燕娥来宋庆龄身边服务的年龄和时间不会有错，因为这个问题，在1962年1月份的时候，宋庆龄有一次在客厅和他谈过的，这个他都是做了相关的记录的。

而后笔者又查阅了当时的历史资料以及宋庆龄年谱中所记载的大事记，通过反复的研究，笔者也比较倾向于周和康老先生所著的这篇文章中的时间。原因有三：

第一，虽然1927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致使大革命失败。当时宋庆龄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态度，于1927年到苏联访问。随后几年她先后到德、法等国继续探求革命的道路。直到1931年，宋庆龄因奔母丧回国。

粗粗看来，宋庆龄在1931年之前，似乎并没有在上海居住过。但是笔者通过反复比对年谱上的时间。发现宋庆龄在1927年7月17日秘密离开武汉返回上海，直到1927年8月22日才由上海出发到苏联进行访问。期间在沪停留居住的时间有一个月。

另外在爱泼斯坦所著的《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中，对李燕娥的描写是这样的：

“……李姐经常住在上海，宋庆龄在上海居住时她照料宋的生活，宋在北京居住时她照看房子和孙中山的衣物——经常翻晒这些衣物是她的任务之一。……”⁽⁷⁾

这篇文章提到了李燕娥的工作情况，宋庆龄从1927年7月底至8月下旬期间住在上海，虽然时间仅为一个月，但是如果要介绍李燕娥到她那工作从时间上来说也是可行的。而且在爱泼斯坦的这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李燕娥在宋庆龄不在的时候的工作是照看房子和经常翻晒先生留下的衣物。宋庆龄为了探求救国的道路一直奔走于各地，在1927年

出访苏联前，请李燕娥过来做管家来照看香山路的房子以及翻晒衣物，在情理上也说得过去。

第二，在1980年5月4日，宋庆龄写给廖承志的一份信中，有这么一段：

“……这段日子我非常苦恼，因为我从前的那个管家病重住院，是癌症。她已经跟了我五十多年了，而且她总是那么可以信赖。……”⁽⁸⁾

而且笔者发现，不仅仅这一份信，在宋庆龄晚年（1980年期间）写给许多友人的信中都会有写到李燕娥的情况，包括她的病情，以及在宋庆龄身边的时间。这中间提到了一个时间50多年。

可见在上文“常见问题”一中，笔者引用的宋庆龄写给周和康的一封信，信中宋庆龄提到了李燕娥在宋庆龄这里服务了快40年，这里“快四十年”，笔者认为只是宋庆龄当时用的一个概数词，她可能仅仅是想表达李燕娥在她身边服务的时间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通过以上两点，确立李燕娥1927年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更为合情合理。而根据宋庆龄的出生年份1893年，便可推算出当时宋庆龄是34岁。

常见问题三：李燕娥究竟有没有结过婚？

在小学语文课文《宋庆龄和她的保姆》一文中有这样一段：

“当知道燕娥的不幸婚姻时，庆龄充满同情地连连说……”⁽¹⁰⁾

上文中所指的李燕娥的不幸婚姻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又翻阅了部分资料，在李云所撰写的一篇名为《随宋庆龄

走过最后三十年》一文中，笔者发现了如下内容：

宋主席对人非常有感情，凡是在她那里工作过的人，她都记得。宋的佣人李燕娥我们都叫她李妈，广东中山人，船民出身，她从小在船上长大的，16岁由父母许配给一个打工的（在汉口一家饭店，专门送饭菜的）。丈夫好喝酒，酒后就打人，所以结婚后没有多久，李妈就出来帮佣。后来李妈实在忍受不了丈夫的折磨，在宋主席的帮助下离了婚。离婚后的李妈，精神好多了。她对我说：“不愿再结婚了，永远跟着夫人。”宋对我说：“你要注意，李妈这段婚姻不愿对任何人谈的，她感到耻辱，你以后绝对不要问她。”⁽¹¹⁾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便可得知李燕娥的确是结过婚的。

常见问题四：宋庆龄为什么要称呼李燕娥为李姐？

李燕娥比宋庆龄小将近20岁，宋庆龄却为何要称她李姐呢？这也是很多游客经常会提到的问题。

在上段李云的回忆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宋庆龄对李燕娥一开始的称呼是“李妈”而并非“李姐”，那是为什么后来就改了称呼呢？

而在周和康老人晚年(2005年)一段回忆录中也写到：

“……在平时，首长对李姐的称呼是李妈。1961年底，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幸事件，李姐为了维护首长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与歹徒搏斗，头部严重受伤，经送华东医院抢救住院治疗。由于多日没有接到李姐亲笔签名信，颇使首长十分不安，后经询问有关

人员，才将真实情况汇报清楚。她闻知李姐头部受伤，忧心如焚，立即决定于1962年1月11日，匆匆赶回上海，一进家里的大门，就用动情的目光，久久凝视李姐受过伤的头部，用手轻轻抚摸着，激动地说：李姐，你受苦了，我在夜里梦见你满头流血，吓得我一夜难眠，这象是梦，亦真亦假，今天才算弄清楚了。然后俩人手挽手一起上楼去休息。中午，李姐手持首长的一封亲笔信交给我，信内说：周同志，今天我本来想下来和你谈谈家里的事，但因神经痛得厉害，只好写在信上讲几句……，李姐的身体很虚，虽然出了医院，但需要休息，精神上受了这样大的刺激，必须放弃一切工作，好好休息。因此，我请你暂时担负李姐平时的责任……。从此开始首长改称李妈为李姐了，并和李姐在一起用膳，进一步加深情谊。……”⁽¹²⁾

综上便可得知，如果说宋庆龄始终称呼小了自己十几岁的李燕娥为“李姐”，这是不正确的。根据上文中周和康提供的时间线索，宋庆龄应是从1962年开始才正式改口称李燕娥为“李姐”。

常见问题五：李燕娥是死于什么疾病？

前不久，我们部门组织了业务学习，是阅读一篇由宋庆龄的保健医生所写的文章，在文中这位医生详细地介绍了他当时给宋庆龄做日常医疗保健的相关情况，在文末提到了宋庆龄关心李燕娥的病情治疗，文中这样写道：

1979年4月，我给上海宋庆龄寓所的工作人员进行体检，查出李燕娥小便的红细胞多，我怀疑是妇科病，就动员她到我们华东医院做进一步的妇科检查，可是李燕娥不愿

意，我就把这个情况向李存仁书记作了汇报，后经李书记亲自动员，李燕娥才到华东医院做了进一步的检查，确诊是子宫颈癌。……

1980年3月初，在一次我去上海宋庆龄寓所看望李燕娥的时候，她跟我说大便次数多，出于职业习惯，我估计可能是肿瘤转移。后经妇科检查，确诊是癌症转移。我们立即与宋庆龄联系，宋庆龄于3月25日派北京宋庆龄寓所的陆森林同志到上海，将李燕娥又接回北京治疗。4月21日，李燕娥在北京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因为已是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后来只能靠药物维持，1981年2月5日她在北京去世。”（13）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便可了解到李燕娥是由于子宫颈癌去世的。

上文中所提到几个问题，均为平日里游客经常会问到的，也是长期以来困扰讲解员的问题。笔者经过整理现得出如上结论，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如有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同仁加以指正。

注释：

（1）《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图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2）（5）周和康：《对〈品质高洁 唯菊与石——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一文错误的更正》，《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10年第1期，第6页

（3）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宋庆龄致周和康》，《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4）一般时间的计算方法分两种阳历、阴

历。阳历是依照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划分的，这是现在世界上通用的时间计算方法，也称公历或是新历。阴历是依照月亮围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划分的。而阴阳历同时考虑了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和月亮围绕地球公转的时间，我们国家过去使用的就是阴历，也就是农历（旧历）。因为月亮围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为29.53天，所以农历一个月短的29天，长的30天。而这样计算就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时间差很多，所以农历每19个回归年中必须加7个闰月，形成了中国的农历。

（6）李云：《往事与情缘——李云回忆录》，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至第79页

（7）爱波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1页至第662页

（8）《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页至第655页

（9）盛永华：《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4页至第1625页

（10）柯岩：《宋庆龄和她的保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级小学语文教科书

（11）李云：《随宋庆龄走过最后三十年》，《新华文摘精华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周和康：《宋庆龄和李燕娥》，《卢湾史话》第三辑，2008年12月25日

（13）胡允平、黄玉抒：《我给宋庆龄做保健医生》，《新民晚报》，2010年2月20日，B7版。

博物馆藏品管理信息系统调研报告

撰文/王宁宁

藏品管理信息系统是提高博物馆日常工作运转效率的重要工具，也是有效地管理海量文物信息的重要载体。目前馆内的藏品管理系统开发建成于10年之前，为馆藏文物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利用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功能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需求。为了更好地进行纪念馆的藏品管理，我们对市面上有代表性的三种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进行了比较分析，期望找到适合自己的信息系统。

在所有的软件开发中，都需要遵从现有的行业标准，因此这三种藏品管理系统都是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手册》等规定的框架上设计的。为了更好地了解各款软件的优势，本文只强调各家系统较有特色的功能，对一些共性的功能设计如备份、系统管理等不再赘述。

国家文物局开发的藏品管理信息系统

国家文物局开发的管理系统由9个模块组成。与藏品管理相关的功能有：文物数据采集、数据检查、备份恢复管理、图像批量处理、统计报表、特殊字管理；与系统维护相关的有动态指标管理和系统管理；另为国家文物局量身定制的文物信息报送功能。

藏品信息的采集从点击数据采集页面上的“新增”按钮开始，弹出文物数据新增页面，输入必要的信息，点击“确定”后进入

编辑文物数据页面。在这一编辑页面中，可以对界面显示的指标进行定制，删除一些不需要的指标项，增加自己所需的指标内容。用户在录入数据时如果遇到生僻的字，可使用“生僻字”功能在需要的位置中插入。系统还提供特殊字的录入和处理功能，特殊字的处理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统一造字并下发的方式，第二种是采用图片显示的方式。因本馆的藏品信息涉及此类信息极少，在此不再展开。在编辑文物数据信息页面，有一项“记录变更”选项。如果用户需要将其后的操作作为变更保存为历史记录时，要在该选项上打上对勾。其后用户对指标内容所作的修改都将作为变更历史记录下来，这对藏品信息的提用、归还等指标适用。当文物的信息基本录入完毕后，查询和统计就显得更加必要了。系统提供四种查询方式：简易查询、标准查询、历史查询和同义词查询，可以基本涵盖所需要的藏品信息。统计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定义统计的指标，除可以生成表格式的结果，还可以更换为柱形图表显示，另外还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作通用报表，这一功能个性化程度更高，操作也较为复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在数据采集界面的附件管理中，可对文物增加图片、视频或其他文件。为了将指定文物的信息以文件的形式存储到数据库系统之外，用来实现数据的安全、数据的合并或传送到其他的机器使用，系统提供文物数据导出功

能。

因初始输入藏品信息恐有疏漏，系统设置了数据检查功能项，可对总登记号这一指标进行唯一性检查，另外对名称、总登记号、文物类别、藏品级别等必填项进行检查。通过审核的数据不允许再修改，在审核前需对数据进行最后的检查与修改，确认无误后再进行审核。

为了提高对图片处理的工作效率，系统提供了对图片文件批量改名的功能。可对选中的多个文件进行规范的文件命名，也可对名称中的字符进行替换或删除及大小写的变更，这对图片信息较为丰富的文物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除此之外，还可批量导入文件、对jpg文件批量产生缩略图、对导入的文件数量进行检查等。

这款软件由国家文物局开发设计，免费提供给国内的博物馆使用，在软件方面，只需购买数据库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Desktop Engine，就可以进行馆藏信息的录入与管理了。但这一软件不支持B/S架构，需要在客户端安装软件，如果遇到客户端硬件更新或操作系统崩溃等问题，还要重新安装软件，较为麻烦。总的来说，这款软件可以基本满足博物馆的藏品信息管理需求，但是后续升级乏力，不太适应现阶段博物馆藏品管理不断发展的需求。

北京中科软件开发的藏品管理系统

北京中科软件有限公司是1999年依托中科院软件所的研发优势组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负责建设的项目有数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刀剪剑、伞扇博物馆的藏品管理信息系统。

这一系统的技术路线是基于B/S的三层体系结构，通过浏览器进行工作。其开发的理念是基于业务流程进行设计的，但是又区别于以往的传统设计。传统的软件设计中，系统功能与功能菜单紧密绑定，用户通过进入不同的菜单，查看是否有需要自己处理的业务。而这一软件做了一些改进，变为基于任务中心的设计，把需要用户办理的多种业务集成在一个列表中，提供给用户集中处理，体现出任务推送到桌面的设计思想。反映在软件中即增加了任务中心功能，在这一项目中，所需要本人处理的工作都在列表中显示，不用到各个功能模块中分别去查询有没有要处理的工作。我们可以在待办和已办任务中查询最近的工作任务，提醒工作人员找到最新的任务。已办任务只可查询，不可修改。以文物工作的流程控制藏品信息的录入与利用，文物工作的开始从征集开始，建立一个征集表单，而后提交给主管领导审批，领导审核后可进行总帐登记或退回表单的选择。进入总帐登记后，可输入藏品的详细信息，如鉴定信息，保护信息，事故信息，影像信息和提用信息，并可进行修改和打印。藏品信息录入后，利用就提到日程上。可在任务中心填写藏品的提用申请、利用申请单，检索出所需文物后，生成藏品利用申请单，提交后出现在待办任务中交由部门领导审批，批准后进入出库流程。这一过程进行到的每一阶段都可在任务中心中找到，提示相关人员处理。

软件设置了专门的库房管理功能模块，包含申请单查询、提用单查询、藏品提借、归还、移动和事故登记。出库时要进行人员的身份验证，可通过手指静脉识别或密码识别，以此生成提单，从而到库房出库。系统

的查询方式和统计功能较为单一，可使用藏品号、名称、组合、收藏位置、拨出地点等方式进行查询。统计功能包括系统总量统计如按总量，级别，类别等、业务总量统计、已有影像文物统计及文物动态等。

这款软件的特点即是将工作任务推送到桌面，较为人性化。但其报价昂贵，还不包括二次开发的费用，对于中小型纪念馆而言投入经费的压力较大。而且软件在查询和统计方面做得不够完善，后期开发的投入不可预估。因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并没有办事处，因而服务响应速度也应考虑其中。

复旦大学开发的藏品管理信息系统

复旦大学在“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工程”项目中开发的博物馆藏品管理信息系统，作为数据采集工具和信息管理系统，可以满足教学、科研和科普的应用需求。

这一藏品管理系统亦是采用B/S架构，无须在客户端安装软件。在藏品登录中，使用藏品增加按钮或右键藏品增加，填写文物的几项必填指标后，进入全字段登录界面，有一张遵从国家标准著录规范的表格。填写保存后，该数据就被暂存于供专家审核校对采集成果用的“审核库”中，此时它还不能由一般检索或统计途径查询利用。接下来要在系统维护中进行进一步的操作。之所以设置该功能，是为了扩大参与登录工作的人员范围。设计者考虑到部分登录操作者可能对藏品分类体系和专业术语不够娴熟，因而避免出现局部登录内容错误，故另设此库专门暂存这类新采集记录。当由保管人员审核待确认无误后，通过“审核库转使用库”功能转到使用库，方能进行检索、统计和打印等正常功能。

在藏品信息数据库基本建立后，日常的利用也应体现在藏品管理信息系统中。该软件提供办理提取退还手续、办理藏品注销手续、办理藏品事故登记等功能。由于藏品的提取和退还并非一次性的，可能会经过多次的利用，在这款软件中增加了提取记录和退还记录指标，记录藏品的这一历史利用信息。还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增加历史记录的信息，如需对藏品的等级信息变动进行记录，可在指标维护里增加等级变动记录这一指标项，并选择历史记录为其属性，即可记录每次变动的的时间、变动人及变动的结果。强大的检索和统计输出功能是这个软件的特点。在藏品检索功能中，可弹出十七种检索方式待选择。较为特殊的是基于全字段记录的全能检索方式，其特点是几乎所有数据库字段项目都成为检索标引。该检索方式可以使用户通过记忆字段记录内容查找目标藏品，这是上述检索方式所不具备的功能。在统计输出中，会有12类统计服务内容。从藏品的信息统计到工作量统计都可以快速准确的计算出来。在附件管理上，该软件不仅提供静态图片登录，还可添加视频、音频、动画和文物模型。图片上传自动以总登记号命名，并自动转为缩略图以供浏览，点击放大后看到的是上传的原始图片。这样既提高了软件的浏览速度，又不影响观看图片的质量。当若干藏品的视频或音频为同一个时，可无需重复添加，只要与藏品产生关联即可，以此节约服务器空间，加快系统的运行速度。

这款软件的优势在于可以快速、准确地建立起数据库。在登录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大量比较相似的藏品，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可以将相似的藏品由一位工作人员登录。假设下一件要登录的藏品与刚才登录的藏品

相似，那么在简目表单界面选中目标记录，然后点击上面的藏品复制，则该记录就被我们复制了一条，修改个性的指标，如总登记号、分类号、尺寸、名称等字段即可保存入库。如果要登录的藏品与使用库中已有的藏品相似，可以通过样本提取功能，将已录入系统的相似藏品提取出来，局部修改后入库。当有10余件属性相似的文物（如一批书信）同时入藏时，可以通过藏品复制功能和选择字段批更新来完成快速录入，如登录一件文物后，复制若干数量，而后通过批量更新功能，找到目标字段“B0213总登记号”，在右侧顶部“请输入更新的表达式”填写框中填写“0000??”，起始数值为1，增加数值为1，按更新后，即可实现总登记号的逐一递增，而后修改个性内容即可。这一总登记号的自动生成功能是上述两款软件不具备的。软件中加入选择字段批更新这一功能，也是适应以往的工作习惯、单位环境变化产生的。当为一批藏品重新进行了科学权威性的鉴定后，或由于术语不标准或者指标定制的疏漏等主客观原因，常会感到某一字段的填写不符合要求，如收藏单位从上海宋庆龄故居改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或者并不是针对基于以往错误的被动更新，而是主动性的更新，像某些完全重复的字段，如收藏单位都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这时适用选择字段批更新功能就极为方便了。

这款软件售价适中，同时包含3年的售后服务。如果在使用过程中碰到问题，因同属一个地区，可以得到及时的响应。

结论

在我们进行选择之前，要对自己的需求再次进行梳理：（1）简洁美观的用户界

面，人机要友好，使用、操作简单明了。

（2）用户权限管理功能要强，切实保证数据库的安全。（3）方便数据导入和数据增、删、改。（4）统计打印方便灵活多样。（5）较高的查全率和查准率。（6）信息要全方位化。不仅文本部分要数字化，还应包括高精度的二维平面图像。图像可作分级放大，局部细致观察。另外还要兼顾以后文物模型的导入。（7）升级方便。

明确了上述需求，我们应该有了相应的判断。总体而言，后两款软件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接下来就要找准立足点，从实际出发选择软件了。就本馆的规模来说，只能算是中小型博物馆；从财力来说，不可能一次投资几十万或上百万；从藏品数量来看，只有1万余件；从人力来看，保管部只有6个人，其中包括征集人员、复制人员，从事文物库房管理的仅有2人。基于以上情况，在选择系统软件时，不应好高骛远。要实事求是的确定自己的目标和方向，选择那些既适合小型博物馆的需要，又符合国家文物局的有关规定而开发的系统软件。同时还要结合本馆的工作程序和内容，以文物藏品档案的保管为目标、以总登记帐为主线，检索为核心，兼顾统计、库房管理等功能。同时还要慎重选择开发商，技术力量强、售后服务好，能提供良好的后续服务和有偿或无偿升级换代服务、对藏品管理工作有一定了解的单位，是纳入考虑的必要条件。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复旦大学开发的藏品管理信息系统较为符合本馆的需求。不仅可以实现上述必须实现的功能，而且价位适中，售后服务方便，是我馆快速实现数字化的首选。



一种文物保护、利用的新方法——三维激光扫描技术

撰文/徐建华

随着科学的进步，特别是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文物保护的方法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三维物体的数字化技术，它不仅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与设计，人体工程学测量、医学等方面，在文物保护等领域也有了用武之地。

以我们故居来说，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作一直是我们的重点，而保护的最基本手段之一是建立完整的档案图纸，因为这些图纸可以为保存故居原貌、为可能进行的修复工程提供直接的科学依据。过去一般都是请专业人员进行人工测绘，制作图纸。但是人工测绘不仅费工费时，精准度在实际工作中常会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而且传统测量的数据最终输出的都是二维结果（如CAD出图）。在逐步数字化的今天，这样的测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现在一种三维激光扫描仪的诞生改变了这一现状。这种大空间高精度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用激光扫描的方法，以较高的速度，快速地捕获大空间范围内的信息，全景录下保护建筑的各个角落。以前常规测量，一般每一点的测量费时都在2-5秒不等，有的甚至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对一点的坐标进行测量，而这种大空间高精度扫描仪最高速度已经达到97万点每秒，保证了对各种复杂物体的详细

描述。扫描仪每次测量的数据不仅仅包含X, Y, Z点的信息，还包括R, G, B颜色信息，同时还有物体反色率的信息，这样全面的信息能给人一种物体在电脑里真实再现的感觉。可见高精度三维激光扫描在采集数据的速度，精度，信息量，色彩信息等方面都是一般测量手段无法做到的。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的数据采集和处理后，获得的彩色原始三维点云文件组成三维点云数据库。它有许多种专用的三维点云格式，能满足对后期数据再处理的需求。我们通过对原始点云数据的各种处理，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文物信息存档、文物展示和其它相关应用。

譬如，通过专门的浏览软件，可以浏览三维点云数据库，数据库的每个点都具有三维坐标系，可以对任意点进行测量，对所标示的区域进行文字或符号的标注，同时能输出各种需求的精准图纸用于存档。三维激光扫描还能定期通过对故居室外的重要立面及室内指定区域建立建筑沉降检测点来显示变形检测。具体来说就是：每年针对同一对象在同一位置进行扫描，建立点云数据库。将往年点云数据库置于同一坐标系进行三维比对，提交色谱误差报告。其主要目的是观察，分析建筑物主体结构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形状况，为日常维护或维修提供重要的数据依据。此外通过对点云数据的后续处

理，还能准确地建立故居各室内外可见的建筑物结构、装饰品、家具等文物以及基本植物等三维模型，以尽可能贴近实际的要求来展现真实的场景、灯光、纹理等信息，形成网络展示的数据。这种数据是高精度的，具有测量功能的虚拟现实文件。通过彩色点云浏览视频，能轻易实现在故居指定房间或区域内以第三方视角的方式进行步行浏览，物品查询和虚拟交互，进而实现虚拟网络纪念馆。

同样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馆藏的文物如：印章、油画、器皿、家具等也可以进行高精度的数据采集。以前我们都是用照相机拍摄文物照片用于存档，但照片时常会出现远焦点变形、清晰度不统一，不能直接反映文物实际尺寸等情况。而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则完全避免了这些缺陷。它通过扫描，能够获取小于0.1毫米的高精度、高密度的原始三维空间坐标信息，每个点都保证清晰，并可测量任意点或多点间的距离，还能保留下文物的纹理信息。文物扫描后，可以随意从

扫描的点云数据库里，获得多个角度的彩色文物图片，如果配以文字加以阐述，还能为文物数字化存档提供非常精确的数据信息。与此同时，通过计算机技术的模拟，还可以建立具有彩色纹理信息的三维模型，用专门的浏览软件，可以旋转、缩放、平移三维成像，为文物的数字化展出提供最有利的保障，进而为建立数字化纪念馆打下基础。当这些馆藏文物具备了高精度的原始数据后，同样也能为其进行定期变形检测，及时掌握藏品的外形变化，为尽快改善保护条件提供科学依据。如果需要对文物进行复制和仿制，扫描后的点云数据库，也能为此提供各种精确的数据信息。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于故居的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的保护与利用都是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技术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古建筑保护和博物馆中应用。相信在我们故居的文物保护、利用方面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上接第33页）

宋庆龄和杨杏佛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同志和好友。从他们彼此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互相之间的关心和信任。

1930年4月，宋庆龄在柏林迁居遗失了一只旅行箱，由于内藏文件，密码、现金和有纪念价值的首饰，所以宋庆龄一直为此事焦急。4月17日，她就写信告诉杨杏佛，她怀疑此箱是在新居内的书房被窃的。鉴于失物之重要以及警方进展缓慢，她请了刑事律师和私家侦探参加侦查。信末说，一旦找回即打电话通知杨杏佛。

1931年，宋庆龄获悉杨杏佛协议离婚后，便在2月27日在信中安慰他说：“我希望你在享受你的新的自由，并有较多机会致力于你已经贡献了较多个精力和时间的工作，真的，既无同志情谊又无同情心的婚姻是毫无意义的。”

如今，宋庆龄和杨杏佛都已逝世，分别安葬于上海宋庆龄陵园，他们一生所为之奋斗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他们美好的革命友情也会超越时空，亘古长存。

个人的历史

选译（连载四）

撰文/文森特·希恩 翻译/郑培燕

11

从汉口到北平的行程花了三个礼拜。这是一次有趣的旅程，不过与从巴黎到伦敦的旅行一样，没什么危险。我很奇怪中国人怎么事先就知道我要去“找个人奇遇”而让我无法实现的。在火车上或旅馆里，他们站起来给我让座；他们为我考虑得非常周到；他们送给我扇子；有时他们甚至不收我的膳宿费。从我离开汉口一直到我抵达北平，我一直都被礼貌包围着；虽然一路上偶尔有点辛苦，也都因这个国家的人热切的礼貌而被尽可能地减少了。除了归结于运气之外，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一点。事实是这个国家纷乱不堪，我的朋友巴兹尔⁽¹⁾，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十天后在我后面去了河南，确信被杀害了。但是我在郑州的那天——除了热之外——并不比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城镇危险。我在街上和商店里四处逛，只有我的翻译跟我在一起，没有遇到一个粗鲁的字眼或姿态，没有破坏那种美好宁静的总体印象。第二天早上我们继续穿过河南，去省那边的洛阳，冯玉祥的总部就在那里。

我对这位基督徒将军的拜访跟我所预想的差不多。他是个高大、迟钝、残忍的人，个人权力欲望高度膨胀。他很无知、暴戾、喜欢发号施令，不过可能是真诚的；他的手下和部队总体来说对他很敬畏。在他的演

说中，在他公开的祈祷中，在他印发给部队的小册子中，他显示出一套思想，部分基于基督教，部分基于孔教——一套伦理思想，而非宗教思想。除了祈祷的事之外，他不太关注宗教中超自然的因素，但他的祈祷文很好。他定期向上帝发出他的要求，从求雨到虔诚祈求敌人被消灭，无所不有。他的国民军（人民的军队——他这么称呼他的队伍）手册中的大多数伦理观念都能在《论语》中找到，但都被冯氏的原始思维给简化成了空壳，失去了古汉语所有高尚的哲学素养。冯就像孔子一样推崇诸如谦逊、宽宏大量、温顺、光明磊落、仁爱、谦卑以及纯洁等等素养，但鉴于这些素养都是这位古老的哲学家深思出来的，我强烈地觉得与这位阴险的苦力出身的军阀的特点极不相称。

汉口来的火车7月9日回来了，我离开了那份相对的奢侈和安全，住进洛阳的一家小旅店。在洛阳（7月10日）我和翻译爬上了一列军列。火车很慢，肮脏不堪，挤满了大兵，说不出的热，数不清打嗝的、吐痰的、臭哄哄的乘客对我这个漂泊在外的外国人却很礼貌。我坐在一个包厢角落里，包厢里挤满了穿制服的苦力，那种闷热和难闻的气味在我印象当中是最糟的；但使我震惊的是，在旅程中，一个大兵脱下他的外套，卷起来给我做垫子。

第二天我们乘渡船过黄河到茅津渡

(Mao-chin-tu)⁽²⁾，“模范军团“阎锡山的地盘。从茅津渡到太原府，该省的省会，是一段漫长的旅行，平安无事，有时乘骡车，有时徒步，有时乘黄包车。有的时候我在那些三个月前就逃离中国的传教士们遗弃的房子里过夜，但更多情况下，唯一的庇护所是路边的小旅店。这些旅店总是有很多臭虫，有时炎热和虫咬使得根本没法在里面睡；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搬到院子里和苦力们一起睡在地上。我的翻译，彭大木⁽³⁾是个宝。晚上，虫咬得睡不着的时候，彭大木就给我讲中国古老的故事，或是耐性极好地回答我问的关于他家乡生活方面的问题。他想做医生，但是革命让他的家庭、他的钱财、他的计划都付诸东流。彭对政治几乎不感兴趣，但对石头和植物，对地质标本或树叶却很着迷。我也许可以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或是其他途径，帮助彭开始他的医生生涯，给中国留个好医生，也留下我的印记，想到这个我觉得很满足。

我们启程9天后到达太原府。道路严格规划后这个老城看上去宁静而迷人，铁路旅馆（法国人开的）让我非常愉快，如果是恺撒里兹（Cesar Ritz）⁽⁴⁾本人开办的话，我就更开心了。阎锡山，这个省的“模范长官”，以教养良好的中国人那种温和的、旧式的礼貌接待了我。从1911年他作为这一要塞的国民党派系，赶走皇权，升起共和国旗帜的那天晚上起，他治理下的山西一直是和平而富足的。阎的记录在中国是独特的。他的省虽然大而富足，但是地处偏远，足以保护其免受中国其它地方所遭受的内战之苦。它跟任何大国都没有直接的接触，也没有性命攸关的江河使之对外国炮艇开放。阎本人，聪明、和善，知道如何利用他的地理优

势；他欢迎法国和德国的技术顾问，这些人总没有日本人、俄国人或是英国人那么危险吧；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建设了公路，挖掘了水井，拓宽并亮化了街道，鼓励商业，保持公共秩序。但在过去的两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者在活动，山西也不再是阎设法创造的那种一成不变的繁荣状态。他公开表示追随孙中山，但是追随的是1911年的孙中山——不是1924年的社会主义的孙中山。认为苦力们应该组织起来要求更好报酬和更好生活条件的想法让他很震动，他那时甚至努力压制工会和农会。

这位哲学大王给了我一辆汽车去张家口（Kalgan），那里，在山西、蒙古和张作霖的地盘交汇的地方，我和彭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军列。我与北美报业联盟的合同到期了，我在中国的剩余的时间里，再不需要找材料去发电报了。我的雇主没有理由对我满意，但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抱怨。里夫的文章他们很受用，足以弥补中国之行的失败，似乎，哲学家们在纽约办公室里也可以像在中国花园里一样生存得很好。

12

1927年夏天，北平是很紧张的。年迈的张作霖还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掌控着那里，大多数外国人和北京的中国人怀着恐惧的心情看待我汉口的朋友们。外国妇女三个月前就接到离开的命令，很多都离开了。要了解外国人的北平并不难：它由公使馆和旅馆，一些商店，一个俱乐部，一些舞厅和大量威士忌组成。我跟别人一样享受这一切，但为了读点书写点东西我搬进了西山的皇家猎苑（Imperial Hunting Park），此后只有当我觉得需要交谈或喝一杯的时候才去北平。

除了知道汉口的政府垮了之外，我对汉口的命运一无所知。最有争议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报纸关于鲍罗廷、孙夫人、普罗梅夫妇和陈友仁的报道。很显然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他们都消失了。一份上海反革命报纸上关于雷娜的报道，使我愤怒地骂人。上面说她和鲍罗廷、在牯岭（Kuling）那里每晚都举行同性恋晚会，把旅馆里大部分香槟储备都用完了。我从没看到鲍罗廷除了喝水之外还喝过别的饮料，雷娜也仅限于一杯啤酒；报纸上说的太荒谬了，这种显然的蓄意恶谋激怒了我。同样捏造的事实也被用在了孙夫人身上，还要更糟：中国到处充斥着关于她的流言，其中主要一个就是说她已经或者就要和陈友仁结婚了。这位不幸的女士是最后一个听说这个荒谬的故事的，几个月后在莫斯科，当她确实听到之后，她的精神大受打击。

兰德尔·古尔德（Randall Gould），美国报纸的新闻记者，将我介绍给苏联大使馆，那里有可能可以得到一些汉口人的消息；但即使是布尔什维克们也没有信息。我在布尔什维克中找到了朋友，他们中有两个，格里涅维奇（Grinievich）和坎托罗维奇（Kantorovich），随时准备就任何话题跟我辩论上几个小时。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也许是因为我越来越不喜欢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而不愿意跟我同国家的人在一起，我跟布尔什维克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其他外国人在一起的时间都要多。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⁵⁾在他那漂亮的中國老房子里请我吃过一两顿饭；一天美国部长请我吃过一顿午餐；俱乐部总是招待地十分周到，我的报界同事也很友善；但在北平我觉得跟布尔什维克们在一

起比跟其他人在一起更自在。我早已通过鲍罗廷熟悉了他们对事件的感知方式，尽管鲍罗廷的睿智即使在布尔什维克中也不是共性，我至少可以和坎托洛维奇、尤什克维奇（Yurishkevich）、格里涅维奇还有其余的人交谈。跟美国人和英国人交流更加不同，很怪，因为事实上我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只会使得基本观点的对立变得更为明显。除了兰德尔·古尔德和他的妻子之外，我在北平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容忍汉口精神。一位美国女士在她精致的中国房子里宴请了我，并对我说了下面一些话：

“你能告诉我将苦力们组成工会有什么好处吗？工会对别人做了什么好事吗？他们把美国弄得一团糟，你在全国都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佣人。为什么孙夫人和那些其他的人要去管他们呢？他们本来那样不是很开心么。”

我明白与任何这样生活考究的女士谈话都是不可能的。我也许会说如果她是个苦力的话她的感受就不同了，但这与她似乎不相关，也很无礼。她代表了北平观点，对这个观点详细讨论时我只能礼貌地微笑并努力让自己不觉得无聊。

北平观点显然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没什么相似之处，但它至少比上海和一些通商口岸的观点更文明。总之，北平外国人的特点是：斯文。在北平，外国人和上层中国人向来是平等结交，每个外国人都有一些中国朋友。有些有很多。北平的外国人对仆人很和善，对中国艺术和文学感兴趣，喜欢玉、刺绣、梅兰芳戏曲和中国烹饪艺术。他们实实在在地与所生活的国家建立了某种联系；他们以外行的方式对中国感兴趣。他们喜欢、佩服甚至有时候理解中国文化，通商口岸外

国人的简单粗暴的行为在他们眼里跟在我眼里是一样低劣的。他们觉得这些行为低劣是出于社会原因——是品位差，或是庸俗，或是没受过教育的人的特性。他们都是在北平非常有教养的、彬彬有礼的上层人士，他们漂亮的中式房子里，布满了柔软的丝绸绣品和精美的雕刻品，属于我见过的最迷人的一种。他们对周围事物的状态非常满意，这使得他们的观点与我的背道而驰。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个美好的世界；中国的苦力，这些被欺压得如同牲口一样的人类，在他们看来“本来那样就很开心”；任何希望改变这种状态的人，特别是那些积极的革命者，是不可思议的怪物。如果一个人北平的客厅里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几乎任何陷于炎热、灰尘、异味以及穷人粗鲁行为的活动就变得荒唐可笑。

我怀疑布尔什维克们几乎不懂玉器和刺绣。无疑苏联大使馆或许让任何内地独裁者后背发凉。不过使馆工作人员的残余仍然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我的朋友，A. I. 坎托罗维奇（A. I. Kantorovich），非常热衷于思考和讨论。你可以把我的想法丢给他，他会继续追根溯源，一问到底或彻底反驳。有一次，他来皇家猎苑和我一起吃饭，我说（我忘了为什么）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生活的整个时代留下了印记——如果女王的性格不是那样，那么那个时代将会不同。坎托罗维奇反驳这一看法，并继续把它推翻。并不是女王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造就了女王。关于这个话题他知道的很多，辩论变得越发积极。拿破仑没有重塑欧洲；欧洲呼唤了，事实上创造了一个必然的拿破仑。有很长时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Makedonsky），一个产生很多历史结果的纯粹的个人偶然事件似乎成了他表达极端布尔什维克论调的障碍。开始，对于他说的这位绅士我很茫然，直到我们的谈话表明原来说的是一身俄国打扮的我们的老朋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我才弄明白。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坎托罗维奇本来是来吃午饭的，直到午夜才返回北平。

我住在猎苑的一座庙里——这座庙被改成旅馆了。我住的这个部分是银色白桦林中的一所小房子，与主建筑相隔离。那里可能好几天除了给我送吃的来的、沉默的中国人之外，都看不到其他人，除了蝎子爬过房顶、银树中小鸟的啁啾声外听不到别的声音。

我每星期从猎苑出发去一趟北平，去看看欢乐的世界或是布尔什维克的世界，或者两个都看看。北平之行喝了很多酒，因为在那炎热的夏夜能让一个相当无聊和担忧的游客解闷的只有威士忌——除非还有香槟和啤酒。一天晚上，英美报社为即将离开的记者们举行了一次宴会，有人草率地邀请我去。不论主人是谁，他可能都在那晚结束之前发现他犯的错误了。我喝了很多啤酒，因而夸夸其谈，对聚集的新闻界人士发表演讲，跟一个美国海军上校争吵，最后在角楼（Tatar Wall）上睡觉以证明我能避开海军岗哨的警戒。

第二天在你和我一样觉得很傻的时候，赢了一场可笑的打赌可以说是个小小的安慰。我决定立刻离开北平，午饭前开车出了猎苑，整理好行李，准备离开。我没有特定的目的地，但是一般情况下我打算去莫斯科；因为在那里，雷娜·普罗梅和我汉口的其他朋友迟早会来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

话。雷娜在火车即将驶出汉口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可能会在莫斯科见面。”这一“可能”与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最为接近。

不过这个时候耽搁了一下——很特别的耽搁。我新近有了一个新亲戚，我从没见过，我得确定她是否跟我一起走之后才能离开北平。

在这么长时间之后，讲出法尼娅·鲍罗廷的真实故事也没什么坏处。张作霖死了；中国和俄国的事态发展变化了；鲍罗廷案子时那种情形现在不会再重演。1927年的国家机密在1935年只是趣闻逸事。和许多趣闻逸事不同的是它确实发生过。

记得鲍罗廷的妻子五月被山东军阀抓住并交给了他上司，张作霖。这个老土匪经人劝说没有扼死她，耽搁了很久，经过多次法律辩论后她在7月被送交审判。为她辩护的是我的朋友A. I. 坎托罗维奇（A. I. Kantorovich），他在苏联外交部的工作是经济法理学家（司法方面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他三个月里不得不花了大多数时间为15或16个被张作霖投入监狱的苏联公民辩护，这些人中主要的一位，至少在舆论看来，是鲍罗廷夫人。把她从折磨和死亡面前救出来是坎托罗维奇的工作，考虑到这个案子的重要，以及被押人的清白，无须过多询问他用了什么方法；是1927年北平的方法。

事实上，我从不知道他到底用了什么办法，不过结果是这样的：办理这个案子的法官一天早上在张作霖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开庭审理了此案。鲍罗廷夫人被审理后立刻被宣告无罪。张作霖起床的时候鲍罗廷夫人已经消失了。法官也不见了。后来听说他去了日

本，他和平的思维习惯鼓励他在鲍罗廷案子结束后尽快去了那个舒适的国家。

张作霖大发雷霆。他还指着能扼死鲍罗廷夫人，但是一个早上就丢了重要人犯和法官，对任何一个军阀来说都太糟了。北平被翻了个底朝天，火车被监视，可疑的房子被抄查，苏联使馆态度温和地请张作霖的人前去搜查，那里没有找到鲍罗廷夫人。张作霖相信——非常确定——在中国，有着鲍罗廷夫人那样显眼外貌的俄国女人跑不了多远。这位女士的照片被发出去，天津的轮船被监视。张在报纸上刊登新闻宣布他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抓住她；外国报纸兴致勃勃；总之，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在被宣告无罪并消失十天之后，从海参崴（Vladivostok）发来的新闻电讯在中外报纸上登出来。这则电讯是（日本）Rengo⁽⁶⁾通讯社发布的，该通讯社和其它通讯社交换新闻。新闻说鲍罗廷夫人乘一艘苏联轮船从中国到了日本，引用了她说的很多在北平被关押和受审的细节。八天后鲍罗廷夫人乘横穿西伯利亚号快车抵达莫斯科，又接受采访，这次是（苏联）塔斯社。对于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因为世界上每一家报纸都登出来了：法尼娅·鲍罗廷已经从张作霖手里逃脱，现在莫斯科很安全。张作霖，尽管满腹狐疑，怀恨在心，不得不承认失败，取消了搜查。

鲍罗廷夫人的这段故事经历大约发生在我到达北平的时候，到八月底就不再是什么重大话题了。一天在北京六国饭店（Grand Hotel de Pekin）跟坎托罗维奇一起用午餐，当他谈到这一段已经褪色的情节的时候，他那种少有的认真让我吃惊。说了一大段开场白后，他问我能否为他和鲍罗廷做点

事情——因为北京政权的不公正而要做的事情，去救人性命的事情。我同意如果能做到就做。只有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法妮亚·鲍罗廷(Fanny Borodin)根本没离开北平——张作霖的刽子手们在城里四处搜索她的时候，她一直就在他的鼻子底下；她仍然藏在某个地方，仅仅是危险性稍小了一点，在一个中国朋友的家里。

他的提议是我把鲍罗廷夫人当作我的亲戚（姐姐、堂姐或是阿姨）带到日本，在那里，在下关(Shimonoseki)，让她上一艘苏联的轮船，这艘船事先已经知道我们要来。行程的危险部分就是从北平到天津的那一段，乘的火车都被张作霖的士兵监视，车上的军官和乘客都在某个时候看到过鲍罗廷夫人的照片。希望行得通的就是我这位姐姐、堂姐或阿姨装作是生病了，只有我那非布尔什维克的外表出现在检票人和士兵的视线里，而不被问到任何问题。

我立刻同意了这一提议；它让我很高兴。没什么事能比偷带一个受害的人从暴怒的军阀手里逃脱让我更高兴了，仅仅是想到从北平去天津的旅程已让我感到很愉快。而受害的人是鲍罗廷的妻子，坎托罗维奇的当事人，这给整个事情增加了瑰丽的一面。我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我的美国护照不能动，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卷到这件事里面去。我对我护照的关注是很正常的，没有它生活将几乎无法忍受。对此坎托罗维奇笑起来。

“你把我们想成什么人了？”他问。“我们对美国护照什么都干不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借一个。”

所以有很多天我有了个新亲戚。但最后打算提供这本重要护照的美国女士改变主意了；我不能跟一个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又患病

的女亲戚一起很好地旅行；这种情况下非布尔什维克的外表再怎么明显也不能保证安全，整个计划未能实现。我很失望。我本可以享受那次旅行的。

坎托罗维奇的计划因为缺少护照而被放弃的那天，报纸上登出了一条从海参崴(Vladivostok)发出的新闻使我急于想离开了。孙夫人、陈和“他们的党”已经乘一艘苏联轮船从上海抵达海参崴(Vladivostok)。孙夫人只说了几句话，但陈友仁发表了长篇大论，我辨别得出那是他措辞的习惯。我可能对海参崴(Vladivostok)发来的电讯有所怀疑，就像一个月前宣称鲍罗廷夫人到了那里一样奇怪；但是海参崴(Vladivostok)没有记者能将陈先生的风格模仿得如同本人一样。我离开了“那个被称为北平的蒙古人的营地”，继续去天津，从中国的各个部分把我的东西收好，在近9月初来到了长城的另一边。

满洲(我国东北的旧称)(Manchuria)像一条满是灰尘的毯子一样在我面前展开，一半是日本人横行，一半充斥着俄国人。直到我到达沈阳(Mukden)发现到处都是日本货币、邮票、警察和日语，我才彻底知道日本人的控制是多么明显。对哈尔滨的控制更强——几乎是纯俄国人的城市，街道上外国人的数量比中国人还多。哈尔滨的建筑和布局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最具有外国特色的，这里即使是最低贱的劳动——那些在其它城市只会留给苦力去干的活——也有白人在干。我在那里的三天从没在我住的旅馆和我常去的饭店听到过一句中文。这些都是短暂的琐碎的印象，无须太过关注，但是当我抵达哈尔滨的时候我的确感觉我已经把中国抛

在一边了。我在日记中记下了大量的评论：“在中国呆了五个月，我认为值得谴责的事情都已经破产了：沉闷的经历。”

穿越西伯利亚的旅行非常单调，令人筋疲力尽。它带着旅行的人穿过这么一个平坦的，广阔无垠，沉闷的国家，每一天看起来都一样，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像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船上度过了。部分路段有水灾，火车不能按计划行进；我们到莫斯科的时间比原定晚了24小时。从哈尔滨出发的这次旅行花了整整9天。

13

我去了萨伏伊饭店（Savoy Hotel）坐下来仔细思考。我怎么才能找到孙夫人、陈友仁和“他们的党”呢？我在莫斯科谁都不认识，对于苏联的统治气氛我还很陌生。例如，我从没想到过去拿起电话，给第三国际打电话找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⁷⁾，问清这些中国人呆在哪里。那种举动在伦敦或纽约是很自然的，但在苏维埃的土地上，对于（根据总体印象）阻断生命运动的困难来说，这却似乎很不适当。萨伏伊大厅行李员建议我试着联系美联社并给了我电话号码。在电话里我的意图没有被充分理解，之后我去了他们的办公室，站在了令人愉快的，豪爽的俄国人克托夫（Kotov）先生面前。我告诉他我想要什么，他建议我们喝杯茶仔细地讨论讨论。我们喝茶，吃鸡，喝伏特加，又喝茶，吃面包，喝伏特加，吃鸡，一个多小时后，我问克托夫他能否帮我找到我想要的。他说他能，但是需要想一想。因此我们又喝茶，喝伏特加，吃鸡，下午很快过去夜色降临。

克托夫告诉我的其它事情中有一个关于

他的前任的很悲伤的故事，是一个美国记者几星期前在莫斯科死了。依照他美国家人的要求，这位绅士被火化了，人们认为他的骨灰应该被撒在莫斯科，在那里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克托夫先生已经尽力去实现这些愿望了，但是骨灰不能撒——真正地撒出去，弥漫开，散布开来——除非从一个相对较高的海拔高度，如飞机飞的那样高度。而出于这一目的是不可能从苏联当局获得飞机的。

“他们不理解”，克托夫先生绝望地说。“我已经全部向他们解释过了，所有办公室和所有局都去过了，但是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把骨灰撒掉。真可恶。”

我希望我是同情他的。

“期间”，我补充道，“骨灰你是怎么处理的？”

“它们在那”，克托夫先生难过地说，隔着桌子指给我看。

它们在一个方的桃木盒子里，非常整洁。

除了鸡肉，茶，面包和伏特加，这件事是一个阴影，对我来说太俄国化了。我问这位和蔼可亲的主人关于找到中国革命者这件事他是否已经考虑好了，他抿了一两口茶后肯定地回答了我。他走到电话跟前，用曲调优美的俄语说了几句话，然后转向我。

“他们在大都会饭店（Metropol Hotel）”，他说。“那个旅馆在大戏院前面的广场上，在左边。他们并不全住在那里，不过他们的办公室在那里。”

我谢过克托夫先生的友好，希望他将来就他前任骨灰的事情能进展顺利，然后离开了。这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我不指望能在办公室找到谁，而是找了个四轮马车直奔

大都会。在那里，就在我到达那大理石台阶的顶上向大厅行李员问讯的时候，我看到雷娜·普罗梅正向我走来。

六星期以来，我都曾经想象过她的头被暴民撕成碎片，被打倒沉入扬子江的淤泥里或是被折磨数天后，在中国哪个荒凉而被人遗忘的地方被不明不白地埋掉了，这些病态的幻想与又与她重逢的想象互相交替，但我从没确定我仅仅去了莫斯科就能够再找到她，并且她还活着，还很健康。现在她就在眼前，快速穿过大厅走来，笑着，双臂张开，她的眼睛在她那火红的头发下面闪闪发亮。

这里我必须尽可能说明的是那时以及之后我们关系的性质。那不是一种性关系——至少，不是现在所理解的这个词语所表达的那种关系。情色小说读者们所知道的那种亲密的言语或暧昧的动作都没有。我不会试图解释这没有任何肉体基础的，普遍的情感，但是它是存在的。如果读了这些话的读者不相信这是可能的，那他最好立刻停止读下去，因为可想而知从这里开始，下面的事实都是很平淡的。

我7月5日在汉口离开雷娜·普罗梅时一点都不激动。那是一个友好的，毫无准备的告别：火车开始启动时的一声大喊，一串笑声，一个手势，和一个点头。这举动也许不自然，因为未来一片渺茫，那时时间紧迫，那个地方形势吃紧；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再见到她。我们那么做仅仅因为那就是我们的行为方式。汉口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的事件，这是很可怕的，让人不敢想，出现什么情况的话我们同时代的人能提供的防护也是轻率的。对付过度紧张的情绪，武器是有用的，但是偏离了最初的目的：它影响了本应

提供保护的念头，而把它变成了麻木和迟钝。

7月5日和9月18日之间，当我在莫斯科走上大都会的台阶的时候，对这一章中所提到的主题，在更宽泛意义上说是对于本书中提到的主题，我的思维从结构到组织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接近的说法是这种变化存在于对某种经历循环中的一种稳定的、有序的思想和感情的浓缩——这种经历循环我称之为“革命”，现在，大约处于辅助的或者说是准备的外部循环中，在一个单一现象之上，这一现象包含着渗透于整个系统的能量原理（但是既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付诸实践）。中心现象——太阳系的太阳——是雷娜·普罗梅。在猎苑的那几个星期里，当她作为人类的命运（作为或许是第八万亿个人类）严重干扰作为同一序列成员的我的分子活动的时候，她的基本原理是在我的意识世界占据中心位置；第一过程是细微的，需要显微镜才能看到并且在与私人事情无关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到；但是第二过程，这一过程中望远镜是合适的仪器，包含了我人生经历和世界观的每一段素材。

当我从大都会门房的台子转过身看到她向我走来的时候这一过程已经完成，但它还需要等到某种重大意义出现的那一刻才能变得不可撤消。从那以后要找到一种生活中必须的关系（一个人和很多人的关系，因果链中的一个点）而不提到这种太阳现象是不可能的了，这个太阳被感知，又失而复得，现实中唯一立体的表现就是这位红发女孩的事故。集中于我的脑海中的，关于她的命运的问题，在任何人看来都是最严重的，最糟的是，它们集中在我脑海里是因为她已经首先面临它们了。在讲述我们汉口会面的时候，

当我说我们都无法逃避地被朝着现实的同一级吸引过去，我是描述了一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状态；眼下，我们在大都会的大堂见面了，她朝着那一级已经走得太远，已经成了即刻发生辐射变化的一部分。细微运动的问题对她不再具有价值；它们已经被解决了；她已经到了她的中心。如果我们将这个中心实体定义为个人生存的意义（或是对意义的信念），作为他对物理环境中在种群各种各样生活中所处确切位置的认知的話，那么可以看到，对我们这样的人，它必须是事情的整体，所有好的总合。我说“对我们这样的人”，因为存在其他的人不受任何中心事实的吸引——愿意消耗他们的时间分配而不试图将这些时间分配跟他们的时间联系在一起——还有别的人通过超自然的信仰和灵魂不朽的简单承诺满足于这一需要。对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一个固定的极性更难建立，因为我们是在人和事的自然世界里去寻求它；但是一旦达到了（正如她已经达到了），它给你的是一种满足，告诉你一种生活，并持续下去。

这些就是我们两个汉口分别之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过程。她已经抵达了她的中心现实（也是我的）并成为其中一部分。她穿过大都会大堂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世界围着她转。如果这听上去像性爱或浪漫的语言，那就是措辞的问题，很难从它们混乱的联系中发掘出纯洁性；但是事实很简单，不是那样的。那种细微的略带香气的情感，浪漫的幻想，狭隘的个人欲望和闺房“爱情”的失望，这时候都沾不上边；后来在陷入灾难漩涡的时候它们也没有影响我们的思维和感情的相关模式。这个悲剧可能包含着爱，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爱可以被分解成是这

种个人感情可以达到的最大限度，是跟人类的整个生活和人类精神寻找自己在宇宙中位置的客观努力有关的。

她穿过大堂，我转过身与她相遇，我们都笑了。

“我知道你已经出现了，”她说。“我哪一天都在期待你。”

注释：

(1) Basil Lang, 音译。

(2) 茅津渡：晋豫两省间的重要渡口，从晋南去河南的捷道。位于山西省云城市平陆县城南约4公里处。

(3) Peng Ta-mu, 音译。

(4) 恺撒·里兹：1850年出生于瑞士，1898年创立了著名的巴黎里兹酒店。1910年，在美国创立丽嘉酒店管理集团

(5) 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06，美国人，古生物学家，又名安得思。

(6) RENGO(联合会)，Japanese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即日本工会总联合会。

(7) 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1887年-1954年)，亦译作鲁易、鲁依，印度革命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及活动家。早年曾为共产主义领袖及理论家，在墨西哥、印度及中国参与领导共产主义革命；后来摒弃共产主义，改为宣扬其“新人民主义”。